臺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
2008 年 6 月，頁 257-314

BIBLID1012-8514(2008)41p.257-314
2007.9.3 收稿，2008.1.7 通過刊登

# 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

## ——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

秦 曼 儀*

### 提 要

在探討讀者和閱讀問題的人文學科，如社會學、文學批評、哲學等之中，法國的書籍史學於 70 年代中葉就此問題對自身展開了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反省。本文透過兩位史家——「法國書籍史之父」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和推動法國書籍史學建構閱讀之問題意識的夏提埃（Roger Chartier）——在研究過程中對批評的回應，探究他們如何在法國書籍史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探討書籍和閱讀的關係。透過比較他們所運用的概念工具、研究取徑和材料，釐清兩人在閱讀經驗的個別差異性以及相關的社會與物質條件等問題上，既分歧又不無交集的對話關係。

另一方面，本文也分析法國書籍史學如何在史家的研究實踐中，形塑出「生產、發行和接受」三稜鏡式的架構，以檢視書籍的歷史，並且把研究對象擴及至歷史上所有物質形式的溝通媒介。在延伸自書籍史的閱讀史研究中，卻忽略了討論作者亦為讀者這個重要的研究視角。本文最後借助這兩位書籍史家擴展至書寫文化史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夏提埃對此領域的定義和反省，檢驗法國近代早期書籍出版中同時身為讀者的作者、編者，在從事或介入的文本寫作和編輯形式中，如何與其訴諸的讀者群建立溝通關係，以及呈現自身的閱讀實踐。

關鍵詞：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 夏提埃（Roger Chartier） 書籍史 閱讀史 書寫文化史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導論
二、前進「未知之地」
三、回應批評：閱讀實踐史研究如何可能？
四、書目學、文本社會學與書寫文化史
五、結語

## 一、導論

法國學界在邁入千禧年之後，推出了《書籍百科辭典》（*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預訂三冊，前兩冊已於 2002、2005 年出版；以下簡稱《辭典》），[1]展現出「書籍史」這門相對於文學史或觀念史等尚屬年輕的學術領域，於過去五十年間所累積的研究經驗和知識成果；更強調這是以史學的反省能力，對於「書籍之死」這個在數位資訊盛行的網路時代所湧現的危機感和思考命題所做的積極回應。因此，藉由此一集體之作，可一覽法國書籍史研究的最新發展和實踐動向。

這部由法國學者籌劃，邀請七百五十餘位國際學者撰文的《辭典》，傳承了《法國出版史》（*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1982-1986）[2]和《法國圖書館史》（*Histoire des bibliothèques françaises*, 1988-1992）[3]的研究與編輯經驗。《辭典》在列舉及定義字詞時，著重於說明該字詞（如「查禁」）在書籍歷史上被使用的脈絡、所關聯的文化現象，或是所指涉的

1 Pascal Fouché, Daniel Péchoin et Philippe Schuwer, dir.,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 sous la responsabilité scientifique de Pascal Fouché, Jean-Dominique Mellot, Alain Nave, Martine Poulain, Philippe Schuwer, préface de Henri-Jean Martin (Paris: É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tome I: A-D, 2002; tome II: E-M, 2005).

2 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Paris: Promodis, 4 vols., 1982-1986; réédition, Paris: Fayard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4 vols., 1989-1991).

3 André Vernet, Claude Jolly, Dominique Varry et Martine Poulain, dir., *Histoire des bibliothèques françaises* (Paris: Promodis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4 vols., 1988-19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義於社會實踐中的演變。除此之外，這部歷史《辭典》具有兩項前所未及的特色：一是嘗試拓展世界書籍史的研究視野，故在地域上納入法國境外的歐洲、美洲和亞洲各地區國家出版事業和圖書館的歷史；[4]再者，它不僅是一部有關書籍和印刷品事務的百科辭典——包括生產技術、物質形式、出版行銷、圖書管理、符號藝術與各領域的專業人員和具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也納入了自傳、信簡、帳簿等既非印刷品亦非書籍形式的日常書寫實物，以及影片、光碟片、網際網路等當代社會的溝通媒介物和媒體。

透過納入非書、非印刷品的書寫物以及新式媒體的作法，《辭典》的學者編輯群呈現一種以社會溝通媒體為新視角和新方向的書籍史學。當代的西方書籍史研究始自二十世紀 50 年代末，費夫賀（Lucien Febvre, 1878-1956）與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 1924-2007）合著的《書籍的出現》（*L'apparition du livre*, 1958），為歐美研究印刷書歷史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整體面向的工作奠下基礎。[5]從這部先驅之作，到《辭典》以各式溝通媒體之歷史知識為認識對象，可以看出法國書籍史研究的融合與吸納能力。本文嘗試從其研究者在跨越學科與國界的學術交流過程中所做的接受與回應，探討此一融合與吸納的建構過程。

然而，本文目的並不在於逐條分析當代法國書籍史所有的研究主題及其研究者。負責編寫《辭典》中「書籍和出版史」部分的梅洛（Jean-Dominique Mellot, 1960-），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曾表示，法國書籍

4 受限於史料取得的方便性和現有研究缺乏比較史的成果累積，這部有關書籍的百科全書式知識，就如編輯在序言所承認的，還是以法語世界和西方歷史為主。

5 Lucien Febvre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1958). 此書已陸續被譯為西班牙文（1962）、英文（1962）、義大利文（1977）、日文（1985）。中譯版：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5）。本文將以《書籍的出現》稱呼*L'apparition du livre*，除了貼切原文，也為避免與馬爾坦另一著作之中譯《現代書的誕生》（*La naissance du livre moderne*），產生混淆。筆者在參閱與引用*L'apparition du livre*一書內文時，根據此書第二版（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19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學是以生產（production）、發行（diffusion）和接受（reception）此三稜鏡式的架構，實踐費夫賀對此研究領域所要求的「整體史」（histoire totale）理念。[6]事實上，構成此三稜鏡之一的「接受」，是 1970 年代中葉啟動法國書籍史學進行認識論和方法論反省的關鍵議題，而就此展開的閱讀史研究，至今方興未艾。那麼，書籍的接受端——讀者和其閱讀——如何成為法國書籍史的研究視點和問題意識？「法國書籍史之父」馬爾坦以及被英美學界視為「新風格法國書籍史」學者代表的夏提埃（Roger Chartier, 1945-）[7]兩人具領導性的學術貢獻，使筆者得以借之爬梳延伸自書籍史的閱讀史研究的發展脈絡。[8]同時，筆者也將對他們所運用的材料、概念工具和研究取徑進行分析與比較，以了解他們在方法論反省和實踐上既分歧又不無交集的對話關係。

為檢視這兩位以歐洲近代早期（early modern）[9]作為研究範圍的史家如何在法國書籍史既有研究基礎上，探討書籍和閱讀的關係，本文第一部分將對馬爾坦的國家博士論文《十七世紀巴黎的書籍、權力與社會，1598-1701》（*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6 《辭典》編輯工作中，「書籍和出版史」原來是由馬爾坦負責；在馬爾坦的推薦下，改由任職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典章文獻學家和書籍史家梅洛（Jean-Dominique Mellot）擔任。2006 年，筆者獲臺大歷史系「學術領域全面提昇計畫」補助，前往法國國家圖書館蒐集本文研究資料，並完成和梅洛的訪談錄音。此篇長達 35 頁的法文訪問稿由臺大歷史系畢業生高雅婷聽寫、記錄為文字形式、筆者校稿、受訪者潤稿之後，正進行中文翻譯工作。關於《辭典》的編輯緣起和過程，請參閱Jean-Dominique Mellot, "Un grand chantier dédié au Livre et ses 'coulisses': le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 (DEL),"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u livre*, n. 116-117 (2002, Bordeaux), pp. 349-361.

7 Peter McDonald and Michael F. Suarez, S. J., eds., *Making Meaning: "Printers of the Mind" and Other Essays. D. F. McKenzi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p. 7.

8 馬爾坦於 2007 年 1 月 13 日去世。同年，夏提埃獲選為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講座教授，以「歐洲近現代的書寫與文化」（Écrit et cultures dans l'Europe moderne）為講座專題。

9 法國史學在時代分期的用語上，"histoire moderne" 指涉的是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這段時期的歷史。英美學界則稱這段時期為 "early modern"。為了避免翻譯造成理解上的混淆，本文皆以「近代早期歷史」翻譯法文之 "histoire modern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下簡稱《書籍、權力與社會》），[10]以及該論文出版當時法國書籍史的研究成果，特別是他和費夫賀合寫的《書籍的出現》加以比較；主要探究馬爾坦在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上的傳承和轉折中，如何看待並處理書籍和閱讀的關係。第二部分則以夏提埃的研究工作為主，探究他如何在「讀者缺席」（缺乏讀者閱讀經驗資料）的限制下，思考和從事閱讀實踐（practiques de la lecture; practices of reading）的歷史研究。第三部分則透過英美書目學（Bibliography）在法國學界的接受脈絡，釐清馬爾坦和夏提埃如何在各自對於閱讀史的關懷焦點上，將書目學的分析方法融入個人的研究當中，尤其是他們對於麥肯錫（Donald Francis McKenzie, 1931- 1999）的「文本社會學」（Sociology of texts）概念的回應。經由爬梳和分析這兩位史家從書籍等印刷出版物的閱讀史，擴展至書籍以外的書寫文化史（History of written culture）的研究歷程之後，本文最後將從書籍史延伸而出的閱讀史研究中所忽略的「書籍作者、編者亦為讀者」的角度，對夏提埃所提出的書寫文化史研究作一反省與回應。

## 二、前進「未知之地」

> 書籍史，乃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問題不在於缺乏博學之作，而是印刷史絕少被納進總的歷史（histoire générale）。一些「文學」史家依舊能花整天的時間論述他們的作者們，卻從不問自己有關印刷、出版、酬金、印製量和盜版等諸多問題，就好像這些問題會讓他們的工作從天上貶降到地上。[11]

10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99; 1ère éd.: 1969)。英譯版：Henri-Jean Martin, translated by David Gerard, *Print, Power and People in 17th-Century France* (Lanham: Scarecrow Press, 1993).

11 這份費夫賀的私人書信文件引述自 Frédéric Barbier, "Posteface. Écrire *L'apparition du livre*," in Lucien Febvre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S.A., 1999), pp. 556-557。費夫賀和馬爾坦合作的歷史，首度經由此文獲得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這封費夫賀於 1952 年寫給馬爾坦的信中，勾勒出他企盼與後者合撰一部將書籍聯繫於「總的歷史」[12]之書籍史研究計畫，以及其所面對來自當時學術環境和研究技術上的雙重挑戰。在費夫賀所處的時代，學院體制內有重視古典語源學（philologie）與古文書學（paléographie）專家培育的典章文獻學院（l'École des chartes），該學院並負責培養國家藏書與檔案資料管理的專業人員；學院外則有書商、藏書家、善本愛好者等行家，是他們最早把書視為實物來研究。但對於強調以跨學科和問題導向從事歷史研究的費夫賀而言，無論是流通於圈內人之間的善本研究，或是具備博學式考證和描述的印刷術史研究，都未能把印刷書的出現與普及的歷史放置在一個連結社會各個面向的視野下加以檢視。而大學裡要求閱讀古典文本的文學史、宗教史、觀念史等傳統學門的訓練，一如費夫賀信中所指出，既忽略了書作為文本載體所具有之物質特性，也未能觀照書籍生產和流通的情況。

費夫賀和馬爾坦這位畢業於上述典章文獻學院、當時任職於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的年輕學者進行合作之後，隨即於 1953 年擬定日後以《書籍的出現》之名出版的計畫大綱和一份成為該書序言的文稿。[13]然而此書在 1958 年出版時，費夫賀已於 1956 年撰寫工作尚在進行中便與世長辭。

---

12 在費夫賀的史學用語和概念中，有關人的「總的歷史」（histoire générale）也就是「社會的歷史」（histoire du social），而不同於經濟史、人口史、社會史（histoire sociale）等。後者是以各自特定研究對象、範圍和方法而彼此區別的研究領域。在他向高等師範學院學生發表的一篇演講辭中，費夫賀強調：「沒有經濟史和社會史〔的切分〕，只有作為統一體的可概括指稱的歷史。從定義上來說，歷史整個就是社會的歷史。」（"il n'y a pa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Il y a l'histoire tout court, dans son Unité. L'histoire qui est sociale tout entière, par définition."）原文收錄於Lucien Febvre, "Vivre l'histoire," in *Combat pour l'histo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92; 1ère éd., 1953), p. 20.

13 在兩人的合作關係中，不僅費夫賀倚重於馬爾坦的古文書學、典章文獻考證的訓練與能力，馬爾坦也為當時年鑑學派從事的社會經濟史所吸引。1952 年，後者在《年鑑：經濟・社會・文明》（*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以下簡稱《年鑑》〔*Annales: E. S. C.*〕）發表了一篇從經濟面向討論十七世紀巴黎出版業的文章，Henri-Jean Martin, "L'Édition parisienne au XVIIe siècle: quelques aspects économiques," *Annales: E. S. C.* (1952, Paris), pp. 303-3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那麼，這部前進於「未知之地」的《書籍的出現》，其「完成或未完成的工作有哪些」？

引號中的提問是借用序言稿裡，費夫賀在思考印刷書自十五世紀中葉出現於西方社會，發展至十八世紀末，這三百年當中所產生的「文化作用與影響」（l'action culturelle et l'influence du livre）時，拋出的問題之一。[14]在與序言稿同時寫成的計畫大綱中，費夫賀首次以「書籍商品」（le livre, cette marchandise）和「書籍酵素」（le livre, ce forment）的概念，架構全書的兩大部分。《書籍的出現》從大學為中心所建構的手抄書謄寫和流通的機制、造紙業發展、活字體製作三個面向，探討構成印刷書出現的出版環境、經濟和技術等先決條件。接著展開一系列環繞「書籍商品」的探究工作，包括印刷書的樣貌如何被呈現，製書成本、籌資、印量和交易活動的經濟問題，印刷工坊開業地點的選擇及其分佈情況，印刷工匠、印刷商、書商等業者和作者的分工及合作關係為何，以及君王和教會權威對此行業的管理和控制政策。馬爾坦與費夫賀仍以傳統印刷技術史研究和古籍善本研究所提供的知識和史料為基礎，但採用當時主導年鑑史學發展之社會經濟史所提供的視角和方法重新提問，[15]並對各個議題的主角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深入分析（譬如在籌資的議題上，依據不同的經營規模，選擇幾位印刷商以說明其商業操作），成功地呈現了書籍的生產、交易和流通等作為思想智識活動之物質條件和人文環境的特質。

但是，在如何回答印刷書之「文化作用與影響」——把書喻為「酵素」的問題上，兩位作者卻陷入困境。[16]根據巴比耶（Frédéric Barbier）的比較，在費夫賀的計畫大綱裡，「書籍酵素」概念的可行分析步驟，

14 Lucien Febvre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p. 12-14.

15 關於年鑑學派的發展史，請參閱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 《書籍的出現》的定稿版也因費夫賀的辭世，改為八章；第二部分的「書籍酵素」則列於全書八章的最後一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如「書籍商品」的部分那麼明確。[17]在以印刷書之「文化作用與影響」，即「書籍酵素」作為問題意識的序言稿中，費夫賀表示，他所欲探究的並非傳統觀念史為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所標定的時間範疇和研究主題，如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宗教改革、自由思想論者、唯物主義者等新思想對「歐洲文化帶來何種影響」。[18]他企望於研究中呈現印刷書為一種「思想傳遞和流通的新方式」（nouveau mode de transmission et de diffusion de la pensée）或「器具」（instrument）。[19]除此之外，費夫賀也曾在一封與馬爾坦討論的信件中，嘗試用其他辭彙，如「作為思想的輔助器」（auxiliaire de la pensé）、「思想的工具」（outil de pensée），[20]表達將書視為一種物質性溝通媒介的想法。從書籍作為「器具」的角度，思考各個時期的新思想得以傳遞和流通，其實是和他提出的「心態裝備」（outillage mental）概念相呼應。

費夫賀以此概念所形構的心態史，反對觀念史研究中把思想抽離於物質環境、獨立於所有限制的作法。[21]當他在思考關於印刷書出現的議題時，所著重的不在於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1400-1468）的天才發明，而是使得此發明能夠實現的物質性可能條件。就如夏提埃所指出的，費夫賀在分析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22]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93-1553）的作品時，其觀點不在於強調研究對象在思想上的大膽和獨創性，而是認識他們身處之時代所形塑和共享的「心態裝備」，

17 Frédéric Barbier, “Posteface. Écrire *L’apparition du livre*,” p. 561.

18 Lucien Febvre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 15.

19 Lucien Febvre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p. 13, 15.

20 Frédéric Barbier, “Posteface. Écrire *L’apparition du livre*,” p. 558.

21 費夫賀對於「心態裝備」概念的闡釋和應用，請參閱Lucien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S. A., 1988; 1^ère éd.: 1942)，尤其是第二部份的第二章：“Les limites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pp. 307-418.

22 Lucien Febvre, *Un destin: Martin Luthe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1^ère éd.: 19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包括語詞、象徵符號、概念等，使其思想之構築成為可能的條件。[23]

一如序文所顯示的，費夫賀並沒有進一步從書籍本身的物質特性，思考連結書籍器具和「心態裝備」概念的可能性。[24]但他試著從書籍器具並不專屬於新思想的觀點，思索呈現「書籍酵素」如何同時服務於統治階層和挑戰權威者，且兼具存續主流價值觀和傳遞新思想。他也企圖依循觀念史所標定的主題和範疇，把各種思想潮流與受到政治勢力、市場需求所影響的書籍商品連結起來。

費夫賀的序言稿主要提供指導性的思考方向，而非具體的研究路徑與分析步驟。對此，馬爾坦所採取的方法是考察所有以印刷書形式傳遞思想的出版情形，以整體出版之各類別書籍的比例和發展趨勢，來了解舊有的價值觀念和新思想之間競爭和消長的變化。由於馬爾坦依賴已完成的書籍目錄彙編，故他僅能針對十五世紀中葉之後五十年間的「襁褓版」（incunables）[25]和十六世紀的書籍進行統計和估量。[26]在針對各類書籍出版之持續性或新書類之出現所提出的解釋中，馬爾坦特別關注書籍的商品化特質或書商、印刷商的牟利取向。例如，對於「襁褓版」印刷書的研究，他首重其接收手抄書原有市場的現象，也指出讀者社群會購買的書籍類別包括聖經等宗教類、拉丁文書籍。他更注意到，人文主義的古典和復古作品的出版，雖然自十六世紀持續成長，但當時的印刷商已經開始擔心市場飽和的問題，而以翻譯作品來擴大此類書籍的讀者群。

相較於費夫賀對「書籍酵素」的構思和提問，馬爾坦在具體實踐其

23 Roger Chartier,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et 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in *Au bord de la falaise: l’histoire entre certitudes et inquiétud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S.A., 1998), p. 37.

24 關於書籍器具和「心態裝備」的連結問題，馬爾坦要到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才用「文本編排」（la mise en texte）和「書頁排版」（la mise en page）的角度，分析書籍、文本之物質形式與思考方式的關係。詳見本文第四節「書目學、文本社會學和書寫文化史」。

25 「襁褓版」（incunables）專指 1454 年、1455 年左右活字印刷術發明之後，到十五世紀末，將近五十年的時間裡，歐洲所製作與出版的印刷書。

26 馬爾坦在《書籍的出現》一書的註釋 351 中詳列其參考的書目彙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析工作上，可從三個面向窺見其創意。首先，他指出了書籍生產所指涉的市場和讀者群。他利用遺產清單中的私人藏書清冊，鑑別書庫所有者的社會階層和職業分佈；[27]不過，此種分析的目的，是為了說明十六世紀印刷書生產的持續成長，也表現在書庫藏書量的增加。其次，在處理印刷術和宗教改革的關係上，馬爾坦區分了思想理念的宗教改革和事件的宗教改革，承載前者內容的印刷書，其效應與非書本形式的印刷傳單截然不同。他在研究中強調，後者才是讓宗教改革運動迅速發展和廣為人知的傳播媒介。再者，於缺乏可資使用的十七和十八世紀書目的研究限制下，馬爾坦一方面透過十六世紀書籍總量和各類別的消長，顯示非拉丁文學市場之持續擴充，特別是宗教改革者著重以方言撰寫宗教書籍和翻譯聖經，更強化拉丁文文化式微的趨勢；另一方面，他則提出印刷事業有助於固定國族語言的拼字和字彙，以此觀點，他勾勒出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拉丁文文化的式微過程中，現代文學得以蓬勃發展的基本要素和特質。

馬爾坦及其後參與書籍史研究的學者，以探索新的視角和可行的方法，持續回應印刷書的「文化作用與影響」——這個費夫賀沒有形塑出具體研究取徑和步驟的問題。在《書籍的出現》最後一章，馬爾坦嘗試把這個問題和書籍生產所指涉的市場及讀者群加以連結，不過，關於閱讀的問題意識卻尚未在此連結中成形。直到 60 年代，他採取當時盛行的計量方法以結合書籍史和心態史的研究中，才更清晰地以「是誰讀什麼」（qui lisait quoi）的問題，提供一個閱讀史研究的新視點。

---

27 馬爾坦是根據當時最新三本研究十六世紀私人藏書清冊的著作所提供的資料和數據。除了典章文獻學院畢業生Nicole Bourdel的論文未註明研究題目，其他兩本分別是：Roger Doucet, *Les Bibliothèques parisiennes au XVI*$^{e}$ *siècle* (Paris: A. et J. Picard, 1956); A. H. Schutz, *Vernacular Books in Parisian Private Librari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apel Hill, N. 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56)。在此之前，Daniel Mornet已使用私人藏書清冊研究十八世紀中葉的讀者之讀物為何的問題：Daniel Mornet, "Les enseignements des bibliothèques privées (1750-1780),"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17 (1910, Paris), pp. 449-4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籍的出現》問世之初，《年鑑》期刊（*Annales: E. S. C.*）或年鑑學派史家均未對此做出特別回應。[28]不過，芒德魯（Robert Mandrou, 1921-1984）等史家基於關注心態史問題，自 60 年代初開始從事印刷讀物的研究。[29]他們藉以重建庶民心態或文化的歷史材料，主要來自非書籍形態的報刊，如「臨時報」（occasionnels）、「鴨報」（canards），[30]或是像芒德魯本身所專注研究的《藍皮文庫》（Bibliothèque bleue）。[31]這類透過訴諸庶民讀者的印刷讀物，認識法國舊制度社會的庶民文化和心態歷史的研究假設和取徑，隨後吸引賀許（Daniel Roche, 1935-）與夏提埃的興趣，並開始投入這塊研究領域。此時尚有另一種研究書籍史的成果出版，即在杜蓬（Alphonse Dupront, 1905-1990）、傅勒（François Furet, 1927-1997）等人領導下，於 1965 年完成的《十八世紀法國的書籍與社

28 反倒是那些費夫賀看來為傳統書籍研究的學者，在其新書評介中對此書的新嘗試和詮釋觀點表示興趣和肯定之意，如：Charles Samaran, “Sur quelques problèmes d’histoire du livre,” *Journal des savants*, avril-juin (1958, Paris), pp. 57-72.

29 並非所有心態史家都強調和書籍史研究結合。有關《書籍的出現》之後年鑑學者以工作團隊進行書籍研究的發展情形，參考Henri-Jean Martin, *Les métamorphoses du livre: Entretiens avec Jean-Marc Chatelain et Christian Jacob*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S.A., 2004), p. 137; Roger Chartier, “Préface. Un livre fondateur,” in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 I: pp. IX-X.

30 「鴨報」（canard）這個字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為「假新聞」之意。此類型為「臨時報」的一種，主要報導如天災（洪水、地震、暴風急雨）所造成怪異悲慘的事件、聳人的犯罪案件，還有奇蹟故事。在形態上，採用便宜的紙，一至數張的篇幅，紙張大小無一定規格，頭版為醒目顯眼的圖像或朗朗上口的標題，再加上賣報人在廣場或十字路口喊叫標題來吸引讀者。法國最早的鴨報出現在十六世紀初，蓬勃於十七世紀上半葉政局混亂的時期，一直持續到十八世紀，由於大革命的暴動而中斷。十七和十八世紀以書籍形態出版的《法國信史》（*Mercure de France*）、《學者報》（*Journal des Savants*）、《百科全書報》（*Journal encyclopédique*），則屬於資訊與知識具可信度的期刊（périodique）。

31 Robert Mandrou, *De la culture populair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la Bibliothèque bleue de Troyes* (Paris: Stock, 1964)。「藍皮文庫」非特定書籍之標題，而是指稱近代早期法國出版史上，由印刷商發明的一種新型出版品。本文將在「回應批評：閱讀實踐史研究如何可能？」中詳細說明此類出版品的形態與使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會》（*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32]這項研究是以大批不同性質圖書資料，[33]進行統計分析而成就的「書籍的計量史」（l'histoire quantitative du livre）。[34]

與此同時，馬爾坦以他在《書籍的出現》中對於整體出版趨勢的分析經驗，投入「書籍的計量史」研究。他在 1969 年出版的國家博士論文《書籍、權力與社會》之序文裡表示，他的研究結合了書籍史與心態史的觀點，因其「關心的不是跟隨幾個作者或是學者的冒險事業，而是一個特定時代裡，有關人們既整體又多樣的訊息」，並質疑「如何能夠理解一個世紀的精神特質，而不對這個世紀整體的印刷生產有些概念？」[35]

在資料的開發和蒐集上，馬爾坦首先利用《國家圖書館印刷書總目錄》前 189 卷，[36]來建立從 1598 到 1701 年之間 17,500 種印有巴黎書商兼出版商地址的印刷書資料，再以此資料與其他外省圖書館藏書目錄、十七世紀的巴黎書商存書清冊，和巴黎私人藏書拍賣清冊進行比較分析。[37]在這些統計數據的支持下，馬爾坦釋析百年間巴黎書籍總生產量

---

32 Geneviève Bollème, Jean Ehrard, François Furet, Daniel Roche et Jacques Roger,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postface d'Alphonse Dupront (Paris-La Haye: Mouton & Co, 1965).

33 包括當時負責全國境內圖書出版的書報總監之登記冊（其中收錄要求出版許可和特權的出版商兼書商）、《學者報》和耶穌會教士編的《泰晤論集》（*Mémoires de Trévoux*）兩大期刊內的書評，巴黎法蘭西科學院與外省科學院的論文集，以及刊印在兜售式小冊中的書名標題。

34 1965 年，除了*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一書外，另有一書亦運用大批系列資料從事十八世紀書籍出版品的計量分析，為Robert Estivals, *La Statistique bibliographique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La Haye: Mouton & Co, 1965).

35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 I: p. 3.

36 原名為*Le Catalogue général des livres imprimé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由於法國早在十六世紀就規定書籍出版物必須向王室圖書館做版本備案，故現今法國國家圖書館除了手抄善本，更擁有豐富的、十九世紀印刷工業現代化之前的「古」印刷書。

37 馬爾坦認為《國家圖書館印刷書總目錄》提供的資料，大體上可做為再現巴黎書籍生產與演變的重要參考史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變化情況，各種題材和寫作文類的書籍在時代中的發展趨向與轉變，以及社會不同階層所涉及的讀物種類和閱讀愛好的傾向。其次，他利用多種過去史家未開發使用的歷史材料，如書商行會的檔案，包括出版契約、書商合作契約、作家和書商所簽之合約，以及國家書報總監的檔案資料等，去探討圖書行業的人文環境，以及國家對於出版業施行的政策問題。

如果《書籍的出現》是憑藉著新的問題意識和研究途徑，以前進書籍史這個「未知之地」，那麼《書籍、權力與社會》則是利用未曾被使用過的檔案文獻，以及運用大批系列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來開發書籍史研究中的「未知之地」。相較於《書籍的出現》以「書籍商品」和「書籍酵素」作為組織架構，《書籍、權力與社會》的特點在於運用系列資料和計量方法來探討「書籍酵素」，從書籍的題材和文類來識別十七世紀巴黎人的心態想法。在「書籍商品」概念下，馬爾坦持續重視書籍歷史中的經濟面向（書籍產量在長期和短週期運動中成長或消退的趨勢變化）、社會面向（主要是關於圖書業者這個社會團體）和政治面向。不過，由於馬爾坦偏重在系列資料的整體性分析，並未對書籍實物形貌的面向另闢專題深入討論。[38]

承繼了費夫賀的書籍史觀和其所開拓的研究途徑，馬爾坦在《書籍、權力與社會》的序言中宣稱，他的研究是要從「十七世紀的巴黎」這個特定的地域與時間脈絡中，提供書籍和社會關係一個「總體性的詮釋」。這種研究立場和實踐，與僅靠統計和分析書目進行心態史研究的工作，

38 不過，書的實物特質並未消失於馬爾坦的觀察和分析中。例如，他注意到，在十七世紀上半葉的出版市場中主要流行的出版形式為對開本；相對於此，十七世紀下半葉的出版業者則為了迎合另一類非博學者的讀者，而大量印刷小開本。另一個例子是他在處理十七世紀所出現大量印刷和流通的盜版書問題時，馬爾坦認為，若要對當時巴黎，甚至全法國實際的書籍產量做出更精準的計算與描繪，勢必要鑑別印上杜撰的印刷商或書商地址的盜版書籍。鑑別的線索即在書體上，如裝飾花刻、印刷工坊在頁紙上簽字的形態。請見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 II: pp. 753-7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十八世紀法國的書籍與社會》，有所區隔。此外，書籍的讀者和閱讀成為《書籍、權力與社會》當中的一個新視點。在概念層次上，馬爾坦認為「公眾」（le public）是出版轉變過程中的「主要行動者」，除了要鑑別此公眾的身分，也需要了解「公眾所讀的書在多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他的反應」（dans quelle mesure le livre qu'il lit conditionne ses réactions）。[39]不過，馬爾坦認為要找到能回答第二個問題的資料，十分困難，但是可以透過私人藏書清冊資料，對於「是誰讀什麼」此一提問進行檢驗。[40]

相較於《書籍的出現》利用了 1480 年到 1600 年間 377 份私人藏書清冊，馬爾坦在《書籍、權力與社會》中則須把書庫區分為大收藏家、中型、小型書庫等不同規模。在處理 600 份中型和小型書庫樣本時，[41]他以社會史所擅長的社會劃分方法，呈現私人書庫所有者的社會階層和職業分佈，與其收藏之書籍類別偏好的關連性。其中，十七世紀下半葉，「穿袍貴族」和「配劍貴族」這兩個長久以來相互區別的社會群體，在藏書選擇上亦表現出極為不同的文化特質。前者的閱讀偏好，以人文主義者標榜的古典權威、天主教史和法國史等研究或查詢用的書籍為主；後者則對新的科學知識、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等當代哲學思潮及流行文學，表現出更多的關心和好奇。因此，馬爾坦認為：「這些〔和配劍貴族比起來〕依舊年輕的穿袍貴族家庭成員所希望的，就好像是要深深紮根於過去，而厭惡任何所有短暫即逝的流行之物。」[42]

馬爾坦憑藉的系列資料甚多，他在解釋統計數據時，卻極為謹慎，並且表示，他的詮釋不過是提供發展書籍史研究的眾多假設之一而已。他甚至提醒研究者，要注意「藏書清冊所未說的」（ce que les inventaires

39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 II: p. 962.

40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 II: p. 962.

41 篩選自十七世紀巴黎人公證文件檔案中的一萬兩千多份死後財產清單，參見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 I: p. 490.

42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 II: p. 9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e disent pas）閱讀活動。[43]也就是說，書庫所有者不意味他讀了擁有的書；反之亦然，進行閱讀活動者，也不一定擁有所閱讀的書。史學家更無從得知那些在公證人或書商清點藏書時被歸類和記錄為「捆成一包」（paquets）的書籍內容為何。此外，價格低廉、廣為流通的劇本印刷本之類的流行文學，也甚少透過典藏和繼承而留下被使用和閱讀的痕跡。[44]對於巴黎商人、工匠等平民百姓的遺產清單中少有書籍紀錄的情形，馬爾坦就從教育史和其他公證文件的簽名，證明這個社會階層的人確實具有「讀」的能力，並進而提出他們所讀之印刷物為何的假設。諸如在巴黎城裡張貼的公告、各式拍賣的廣告文宣、街上叫賣的鴨報，以及特魯瓦市（Troyes）印刷商發行、藉流動的行腳商販賣到全國各地（包括首都巴黎）的廉價書或冊子等，在馬爾坦看來，都不無可能。[45]

60 年代強調結合書籍史和心態史的研究，是要與專注於特別個體之文學或思想作品的文學史和觀念史研究有所區別，而從整體的印刷書生產來認識社會成員集體的心態、觀念和信仰。從這個角度觀之，馬爾坦的研究強化了此種史學實踐。他在「是誰讀什麼」這個閱讀問題的探究上，主要採用當時流行的計量方法，透過階層與職業的劃分，建立書籍之社會分配的圖像，並進而探問「藏書清冊所未說的」，對於此類史料和計量方法的研究限制做出反省。如他所指出的，藏書清冊不能透露讀者「所讀的書在多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反應」。對於這個費夫賀式的心態史提問，馬爾坦以為資料闕如而放棄處理，卻標示了他日後在閱讀史研究上的觀察角度和思考方向。

43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 I: pp. 535-551.

44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 I: pp. 514-515.

45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 I: pp. 536-5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三、回應批評：閱讀實踐史研究如何可能？

從 1970 年代起，心態史研究以觀念信仰為特定時期社會中所有群體所共享的預設，以及其採用系列和計量方法處理書籍等文化產物的方式，遭到法國年鑑學派內部成員，如厄哈德（Jean Ehrard），[46]以及義大利史家馮圖立（Franco Venturi, 1914-1994）、[47]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 1939-）[48]等人的批評。以下將透過夏提埃在 70 年代中葉到 90 年代初所發表的實作研究和方法論反思，了解他如何在書籍史—心態史的訓練下，對批判聲浪作出回應。

我們首先借助夏提埃和賀許於 1974 年共同發表的〈書籍：一個視野的改變〉（"Le Livre. Un changement de perspective"）一文，[49]檢視在馬爾坦的《書籍、權力與社會》之後，與心態史觀結合的書籍史研究對於讀者和閱讀面向的探詢工作。這篇文章收入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和諾哈（Pierre Nora, 1931-）主編的《歷史之實作》（*Faire de l'histoire*）。兩位作者強調，書籍史採取社會經濟史的清點計算方式，把「書籍形式下的各種論述置於一個既無優劣位階，也不受排除的均質性的研究場域」，[50]以自別於僅關注經典作品的文學史。在延續馬爾坦等人於 60 年代建構的書籍史定義下，兩位作者亦接受達頓（Robert Darnton, 1939-）等美國學者的指正——不論是馬爾坦以十七世紀巴黎地

46 Jean Ehrard, "Histoire des idées et histoire littéraire," in *Problèmes et méthodes de l'histoire littéraire: Colloque 18 novembre 1972*, Publications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Paris: Armand Colin, 1974), pp. 68-80.

47 關於Franco Venturi 在*Utopia e riforma nell'Illuminismo* (Turin: Einaudi editore, 1970) 的批評觀點，請見Roger Chartier,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et 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p. 45.

48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義文原版：1976).

49 Roger Chartier et Daniel Roche, "Le Livre. Un changement de perspective," in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dir., *Faire de l'histoire, t. III: nouveaux objets* (Paris: Gallimard, 1986; 1ère éd.: 1974), pp. 156-184.

50 Roger Chartier et Daniel Roche, "Le Livre. Un changement de perspective," p. 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區，或傅勒以十八世紀法國為考察範圍所做的研究，在其建立書籍清單時，都忽略了法國境外印刷的禁書在王國內非法行銷和流通的情形。

在這篇以檢驗並比較十七和十八世紀歐洲地區書籍生產總量為問題核心的文章中，對於閱讀議題的視點卻從「是誰讀什麼」，擴展至關注「如何取得以及在哪裡讀」。關心在行銷之外，各種書籍流通方式的文化社會學，提醒了書籍史家不應只以遺產清單和私人書庫目錄來建立印刷書的社會分佈。像是有別於開設在城鎮裡的書店的流動書商，或者私人購書與藏書以外的閱讀制度，如公共圖書館的存在，這些都屬於近代早期社會裡讀者取得書籍的途徑，其組織和運作方式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了解。

另一方面，相較於之前藉書類統計來掌握閱讀品味的發展趨勢和變化的書籍史家，夏提埃和賀許強調在圖像分析、符號學等學科奧援下，以新的取徑展開「書籍的文化意義」的研究。除了從圖像的再現分析書籍在歐洲社會，自文藝復興到十八世紀文化象徵的轉變意涵外，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方法，是去觀察書籍「表面」上的各種符號，如標題、插圖和排版的使用。例如，在研究歐洲近代早期出版的印刷書籍中所出現具有廣告功能的標題時，心態史家注意到這些標題都相當冗長，目的在詳細告知讀者關於書的內容。研究者便利用此一特性，將計量方法運用在分析標題的語言，即統計某一時期書名總量的辭彙使用頻率，以顯示集體心態和觀念的特質和趨勢。

夏提埃和賀許在 1977 年再次共同發表〈書籍的計量史〉（“L’Histoire quantitative du livre”）一文，[51]則重新肯定和辯護計量方法在分析「書籍商品」上的必要性，認為此種研究方式能夠有效掌握書籍的交易量，並建構買賣和流通的地理分佈圖。不過，如何把書籍與文本系列化和量化，以探求認識社會普遍的、集體的心態觀念，才是該篇文章回應批判的重心所在。兩位作者在文中首先陳述他們所理解並欲回應的批評：在心態

51 Roger Chartier et Daniel Roche, “L’Histoire quantitative du livre,”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u livre*, 16 (1977, Bordeaux), pp. 477-5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家從事書籍研究時，傾向於判定大量的次等作品，認為這樣的研究方式比僅僅研究幾部重要作品，更能夠認識社會的「真相」。但批評者認為，在偏重以系列資料和計量分析的研究取徑下，不僅忽略了具獨特創意的重要作品和社會的關係，其所標榜的客觀性，就和它意圖有別於主觀性的質性描述一樣，也隱含著觀察者的預設立場與偏見。對於上述批評，夏提埃和賀許認為需要導正書籍計量史家過於重視數字的傾向，但仍憑藉既有成果為計量方法的重要性加以辯護，認為不論是以集體心態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還是清點計算，書籍計量史都有其學術研究上的卓越貢獻。夏提埃和賀許堅持歷史研究須平等看待和認識所有的出版作品，但強調書籍計量史並不因此貶抑具有創造性的思想作品，更不漠視文本的意義是產生於閱讀活動中所作出的詮釋。

在這些立場的重申和宣稱中，最後一項有關閱讀的研究方向，是此篇文章和批評聲浪唯一的對話交集：夏提埃和賀許承認，若要以書籍史作為認識集體心態之研究取徑，則必須去探問「讀者對其讀物的操作」（ce que le lecteur fait de ses lectures）。[52]金茲伯格在解析十六世紀一位被指控為異端的磨坊主，面對宗教裁判所審問其讀物時的回答紀錄上，對此提問已做了一個很好的研究示範。[53]那麼，對於以長時段為範圍，以所有的出版作品、社會集體心態或共同想法為認識對象的書籍史—心態史來說，要如何處理讀者的閱讀操作和閱讀經驗的問題呢？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事實上貫穿了夏提埃從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一系列以庶民大眾為銷售或訴求對象的印刷物和文本作為分析材料的研究。在思考如何研究以及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夏提埃既批判了芒德魯等心態史學家企圖透過《藍皮文庫》等銷售給庶民的印刷讀物，以求發現庶民世界觀此種論點的錯誤預設，也從書寫物的文本性（la textualité des objets écrits）和文本的物質性（la matérialité des textes）的面向，反省閱讀史研究的可能性和限制。不過，這種從銷售給庶民大眾印刷物出發，以探

52 Roger Chartier et Daniel Roche, “L’Histoire quantitative du livre,” p. 492.

53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其讀者如何展開閱讀和使用的研究視角，所關注的讀者是被放在與文本作者、書籍編輯、書籍製作者和出版商的對立位置，即將閱讀一事專屬於在此接受端位置的讀者。

不同於馬爾坦等書籍計量史家，夏提埃習以宏觀視野考察整體書籍出版事業中各類別之消長，以掌握閱讀品味的變化趨勢，他在 1976 年發表的〈準備死亡的藝術，1450-1600〉（“Les arts de mourir, 1450-1600”）一文，[54]即以特定的書籍類別為研究對象。夏提埃一方面依循書籍計量史的研究方法，利用書目統計，以掌握「準備死亡的藝術」（Ars moriendi）書類在十五世紀中葉到十七世紀初出版之整體宗教書籍中的消長情況。另一方面，他透過分析此類書籍裡的書寫和圖像文本，以了解當時信仰態度和行為舉止的重要轉變。此一新研究取徑的假設基礎在於，經由書寫和圖像文本構成的論述，既形塑也表達了社會面對死亡的集體再現（représentation collective）。但由於觀察到此規範性論述裡，亦包含對迷信行為所發出的禁令和譴責，夏提埃特別指出，此研究還須進一步檢視論述所屬的再現系統與行為經驗——即實踐（pratiques）面向——之間的落差問題，以超越「再現的歷史」（une histoire des représentations）。[55]

夏提埃在十年之後，改寫這篇文章，題目更易為〈規範與行為：準備死亡的藝術，1450-1600〉（“Normes et conduites: les arts de mourir [1450-1600]”），收進他的論文集《法國舊體制時期的讀物和讀者》（*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56]新、舊作的差別，在於夏提埃刪去原版結論中對於書籍史一心態史偏重系列資料和計量方法的肯定，取而代之的是「計算書名和出版量是不足夠的」[57]等反

54 Roger Chartier, “Les arts de mourir, 1450-1600,” *Annales: E. S. C.*, n. 1 (janvier-février, 1976, Paris), pp. 51-75.

55 Roger Chartier, “Les arts de mourir, 1450-1600,” pp. 68-69.

56 Roger Chartier, *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57 Roger Chartier, “Normes et conduites: les arts de mourir (1450-1600),” in *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 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省話語，突顯出這篇文章對文本陳述進行分析的特質。其次，把規範和實踐之間的落差問題延伸於思考書籍和閱讀的關係，夏提埃指出：「的確，指令不總是導出服從的結果，禁令也絕非表示被禁者就依令不為。若認為『準備死亡的藝術』這類書籍所說明的就是當時所有人用來思考和體會死亡的方式，這種想法是相當危險的。」[58]

夏提埃在 1982 年發表的〈思想史或是社會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一文中，已清楚建構出上述反省的理論基礎。[59]除了借助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集體再現」的概念，思考社會認同的展示形式或權力的表現符號，[60]他主要根據金茲伯格的歷史研究，與瑟鐸（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對消費文化（包括閱讀行為）的理論反省，質疑視讀者為印刷物被動之接受端的心態史研究。夏提埃視閱讀為一種文化實踐（pratique culturelle），主張讀者對讀物具有創造性和發明性的挪用（appropriation）能力。然而，在他

58 Roger Chartier, "Normes et conduites: les arts de mourir (1450-1600)," p. 156.

59 此文首先在 1980 年由Cornell University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宣讀，收錄於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 (tr. Jane Kaplan), in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46. 筆者以下的引文根據法文版Roger Chartier,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et 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pp. 27-66.

60 在他對於再現概念的討論中，夏提埃強調，社會認同的展示形式或權力的表現符號並不侷限於書寫語言，如文學性作品、政治或宗教威權的規範性論述，還包括各種圖像、儀式、慶典活動等。故集體再現為社會現實（réalité）的組成部分，其承載的象徵意義或為個體所接受、認同，或受到挑戰、對抗，即所謂的「再現的抗爭」（luttes de représentation）。請參閱Roger Chartier, "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 *Annales: E. S. C.*, n. 6 (novembre-décembre 1989, Paris), pp. 1505-1520; 英譯版："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 in Jacques Revel and Lynn Hunt, ed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p. 544-558, 以及 "Pouvoirs et limites de la représentation. Marin, le discours et l'image." in *Au bord de la falaise*, pp. 173-190; 英譯版："The Powers and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in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90-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續以銷售給庶民大眾的書籍和文本，探究閱讀實踐歷史的研究當中，其所遭遇到最大的困難和挑戰在於，如何在缺乏讀者自己寫下其閱讀經驗的情況下，回答「什麼是閱讀？如何重構古時的閱讀？」（Qu'est-ce que lire? Comment restituer les lectures anciennes?）的問題。[61]

夏提埃在〈準備死亡的藝術〉一文，從實踐的角度，對於社會威權者之於庶民、文本之於讀者的全面控制和影響力提出了質疑。閱讀實踐除了以一種指導性的概念，對於研究書籍和社會關係的工作提供批判和反省，也開始成為分析的對象。夏提埃在 1982 年發表〈文學形象與社會經驗：《藍皮文庫》裡的乞丐文學〉（"Figures littéraires et expériences sociales: la littérature de la gueuserie dans la Bibliothèque bleue"）一文，[62] 以 1630 年到 1850 年出版的《藍皮文庫》中一種特殊的文學類別——「乞丐文學」（la littérature de la gueuserie），作為分析材料，旨在了解創造《藍皮文庫》這種出版品的特魯瓦印刷商，和他們在里昂、盧昂（Rouen）的競爭者，於編輯、出版方面的操作模式，以及購買者的閱讀活動。[63]該文將書目的總量統計，代之以一系列代表性作品的文本分析。夏提埃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對於被選入《藍皮文庫》的每部作品之前的版本系譜進行爬梳，包括分析最初被書寫紀錄的故事原型，對照其後的印刷文本；並比較在不同作者和寫作類別下，標題和內容的更改或增添情況，甚至檢視由同一作者所創作出的不同版本。夏提埃比較《藍皮文庫》所選擇的原版和經過編輯調整後所出版的版本，兩者在排版方面的差異之處，從而得出當特魯瓦城的印刷商在考量何者適合於庶民讀者群的閱讀時，不僅表現在對於敘事風格類型（流浪冒險式或詼諧有趣）和故事版本的選擇上，也顯示在編輯和排版的操作上。後者對於文本的處理不在於改

61 Roger Chartier,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et 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p. 57.

62 Roger Chartier, "Figures littéraires et expériences sociales: la littérature de la gueuserie dans la Bibliothèque bleue," in *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p. 271-351.此篇文章最早發表在Roger Chartier, *Figures de la gueuserie* (Paris: Montalba, 1982), pp. 11-106.

63 Roger Chartier, "Figures littéraires et expériences sociales," p. 2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寫」文字內容，而是刪減文句的長度、加入章節、增加段落，把文本切割成更具「可讀性」的單元和形式。

夏提埃在解釋何以「乞丐文學」這種以社會邊緣人、威脅社會秩序者為主角的故事類型，會深受讀者大眾歡迎的問題時，因缺乏《藍皮文庫》購買者所留下的閱讀資料，而造成了研究上的限制。他借由觀察近代早期都市生活中的特徵，如當時大量湧入城市的乞丐、無賴，作為研究上的輔助，提出讀者的期待視域中，何以對這類人既心生恐懼，又受其故事所吸引的原因。除了引證「乞丐文學」長達兩百年的持續出版和廉價販售的事實，以說明此類故事大受歡迎，夏提埃還透過社會環境、讀者的期待視域和迎合此期待的特魯瓦印刷商之出版策略三個面向的連結關係，探究和解釋《藍皮文庫》購書者的閱讀行為。在〈出版策略和庶民讀物，1536-1660〉（"Stratégies éditoriales et lectures populaires [1536-1660]"）文中，夏提埃也同樣在缺乏讀者之閱讀經驗資料的限制下，嘗試分析「讀者的戰術」（tactiques de lecteurs，此乃瑟鐸在《日常的發明》〔*L'Invention du quotidien*〕書中的用詞）。[64]

除了以「外圍」的線索理解讀者為什麼、以及如何閱讀的問題，夏提埃另又採用文化社會學的取徑，以研究書籍等印刷讀物的使用。其實，他和賀許在 1974 年和 1977 年共同發表的文章中皆指出，書籍史在文化社會學的提醒下，已把注意力從書籍擁有的社會分配，轉向關心閱讀作為一種文化行為和社會現象的面向，並以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 1928-）在《法國近代早期的社會和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1975）[65]中對印刷和庶民之關係所做的分析和提出的觀點

64 Roger Chartier, "Stratégies éditoriales et lectures populaires (1536-1660)," in *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 87。此篇文章首先發表在Henri-Jean Martin et Roger Chartier,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 Le Livre conquérant. Du Moyen Âge au milieu du XVII*e *siècle* (Paris: Promodis, 1982), pp. 585-603。下文在參閱與引用《法國出版史》時，將根據第二版(Paris: Fayard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89-1991)。

65 Natalie Zemon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ssay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89-2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為模範。不同於艾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 1923-）認為印刷術所形塑的是一種同質性文化的觀點，[66]戴維斯的〈印刷與庶民〉（"Printing and the People"）則旨在提醒當研究者思考印刷書籍對於社會的影響問題時，須注意書籍在社會內部的不同效應，以及讀者以不同管道和方式獲取和使用書籍。夏提埃和賀許共同在《法國出版史》第二冊發表的論文〈印刷物的城市實踐〉（"Les Pratiques urbaines de l'imprimé", 1984），[67]以及他個人為《私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1986）第三冊所撰寫的〈書寫的實踐〉（"Les Pratiques de l'écrit"）一文，[68]均從此視角檢視包括書籍形式的諸種印刷品在城市空間如何流通和使用。

史學家借助新發現的檔案資料，以及文學作品與私人書寫裡的記述，得以具體分析讀者除了購買之外，還有其他取得書籍讀物的方式途徑。諸如：親朋好友間的互通有無，各種隸屬於不同組織體制，如國王的、城市的、教學機構的、主教區的或修道院的公共圖書館（主要對文人和學者公眾開放），由書店老闆所經營的租書店，[69]以及各種限定會員身分為有教養人士的「文學會」（sociétés littéraires）或「閱讀坊」（chambre de lecture）等。而圖像文本和書寫文本，如文學作品、私人書信、回憶錄，正能夠補充這些制度性檔案資料所無法再現的閱讀行為和閱讀環境。例如，向租書店租《新聞報》（*Gazette*）的庶民讀者，高

66 Elizabeth L. Eisenstein, "L'avènement de l'imprimerie et la Réforme," *Annales: E. S. C.*, n. 6 (novembre-décembre, 1971, Paris), pp. 1355-1382;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Volumes I and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irst published: 1979).

67 Roger Chartier et Daniel Roche, "Les pratiques urbaines de l'imprimé," in 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00-1830* (Paris: Fayard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90; 1ère éd.: 1984), pp. 521-558.

68 Roger Charti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in Philippe Ariès et Georges Duby, dir.,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ome 3: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volume dirigé par R. Chartier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6), pp. 113-161.

69 當時稱為「閱讀室」（cabinet de lecture）或「文學室」（cabinet littérair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聲地在店家門口向人朗讀他所讀到的新聞，或是出現在十八世紀以獨處閱讀為主題的繪畫作品，特別是以女性讀者為主角的畫作。雖然阿里埃斯（Philipe Ariès, 1914-1984）在《私生活史》所提的近代閱讀私密化（privatisation）的命題，可以作為這些畫中人物的閱讀姿勢和神情、其方便閱讀的服裝和傢俱擺飾的說明。[70]但夏提埃更細緻地論證，儘管在閱讀私密化的趨向中，閱讀的集體性和公開性也從未消失。菁英讀者不僅熟悉靜默的、獨處的閱讀，也在社交聚會時高聲朗讀給友伴們欣賞和共享。同樣的，私密性的閱讀亦不專屬於菁英社群，即便不熟稔書籍文化，依賴他人或是自己發聲朗讀的庶民讀者，也會在閱讀和挪用的過程中建立個人和讀物的私密關係。

透過一系列對於銷售給庶民大眾之印刷物的研究，夏提埃重新啟用早先馬爾坦的論點，強調不能因書籍較少出現在社會底層的遺產清單當中，因而論斷書籍是專屬於菁英社會的。他首先依據馬爾坦的研究，[71]對於芒德魯等人視《藍皮文庫》為鄉下庶民文學，或主張其反映鄉下庶民的心態和文化的說法，提出修正。

《藍皮文庫》出現於十七世紀初，係以藍皮為底，紙質與印刷皆屬粗糙，價錢又低廉的小冊書，特魯瓦印刷商最初是以巴黎城裡的庶民為銷售對象，到十八世紀才透過行腳商人普遍流傳至鄉下地區。夏提埃主張文本在社會上的使用情形，其實具有流通和分享的特性，因此他質疑「庶民文化」概念的有效性。舉例而言，《藍皮文庫》裡收集了各類文本，包括天主教教義問答等宗教性質的或實用常識的文本、小說等文學作品，以及曾經在上層社會暢銷流行的出版品，如以宮廷禮儀與用語為模範的書信範本。這些暢銷書和文學作品或因不再為菁英讀者群所垂

70 Philippe Ariè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in Philippe Ariès et Georges Duby, dir.,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ome 3: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pp. 7-19.

71 Henri-Jean Martin, “Culture écrite et culture orale, culture savante et culture populaire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Journal des Savants*, (juillet-septembre, 1975, Paris), pp. 225-2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青，或是超過版權年限，而可自由印刷出版，成為特魯瓦印刷商用以開闢新市場的資源。因此，在銷售給庶民大眾的書中，仍有被視為屬菁英文化的讀物，有錢、有地位的人士也會因為好奇而購買或收藏《藍皮文庫》書冊。夏提埃不同意傳統心態史採用社會史慣用的社會劃分方式區別庶民文化與菁英文化，或本質主義式的區分它們各自的純粹內涵。他主張透過書籍的物質特性，如開本、裝訂和編排設計，以及書籍的使用方式，來理解書籍文化中的社會區別特性，以及區別過程中所出現之模仿和佔有的交流特質。

值得注意的是，圖像和書寫文本雖然提供了書籍使用、閱讀行為等實踐活動的再現方式，但夏提埃在〈印刷物的城市實踐〉一文的分析中，同時試圖去識別這些再現的表達之意，理解其作者從事的「再現之抗爭」（luttes de représentation）為何。[72]例如，拉博登（Nicolas Rétif de La Bretonne, 1734-1806）在《父親的一生》（*La Vie de mon père*, 1778）中，描述童年鄉居生活，其父每每在晚上家人聚會時，高聲朗讀聖經。這重要性的一幕情節出現在這部小說式自傳的第二冊，該卷首插畫則是特別選了一幅出自畫家格茲（Jean-Baptiste Greuze, 1725-1805）之手，由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在其評論中命名為《向孩子們朗讀聖經的父親》（*Père qui lit l'Ecriture sainte à ses enfants*, 1755）的畫作。然而，在十九世紀以前，閱讀甚少出現於農民的夜間聚會活動中，[73]故這些圖像或文本中的再現或許並非實際的鄉村閱讀實踐，而是表達了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這類反彈都市文明矯揉造作的文人菁英們，對於失去的閱讀價值的懷念和想像。

---

72 Roger Chartier et Daniel Roche, "Les pratiques urbaines de l'imprimé," in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00-1830*, pp. 521-558.

73 史學考證的說明，請見Roger Chartier, "Annexe. La lecture dans la veillée: Réalité ou mythe ?," （此篇為"Représentation et pratiques: lectures paysannes au XVIII$^{e}$ siècle"一文的附錄）in *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p. 245-2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再現閱讀實踐的文本本身，亦有其意涵建構的歷史需要被研究者了解和重構。在此方法論的嚴格檢驗下，所有呈現閱讀經驗的文學描述，甚至讀者私人性質的紀錄、自傳，都需要對意涵的建構脈絡進行分析。夏提埃兩篇有關《藍皮文庫》讀者閱讀經驗的研究，即是在此反省下所完成。[74]其中一篇研究是關於十八世紀一位牧羊人出身的自學者杜瓦勒（Valentin Jamerey-Duval, 1695-1755），其自傳手稿不僅保存至今，[75]且杜瓦勒在自傳中描述了他年輕時如何和其他農民一樣閱讀《藍皮文庫》所提供的讀物，並對這些讀物和農民的使用做出評論。然而，夏提埃指出，這些描述和評論是在寫作者已成為學者社群一員（洛林地區科學院歷史教授）時所表述和思考的，其設想的閱讀對象和效果勢必限制他在描述其閱讀《藍皮文庫》之經驗的選擇，也決定了他採取批判的立場，即強調《藍皮文庫》對風俗道德的負面影響。另一份研究當中，夏提埃運用的材料是法國大革命初期國家議會代表擬定的〈有關農村居民方言土話和風俗道德〉的問卷調查（“Questions relatives au patois et aux moeurs des gens de la campagne”），內容包括了詢問鄉人的書籍閱讀情況和習慣。在此，再現的問題再次受到研究者的檢驗，由於訪問者和填寫問卷者皆屬神職人員等地方菁英，故夏提埃認為必須考量和分析這些再現農民閱讀的書寫形式、敘述情境和寫作者的價值認同，而不能直接拿來引證為十八世紀末農民的閱讀經驗。

研究歐洲近代早期庶民的閱讀實踐，不僅限於資料缺乏，更困難的是資料鮮少直接或透明的呈現讀者自身的閱讀經驗，且此類經驗亦無法

74 Roger Chartier, “Livres bleus et lectures populaires,” in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pp. 657-673; Roger Chartier, “Représentation et pratiques: lectures paysannes au XVIII$^{e}$ siècle,” in *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p. 223-246.

75 Valentin Jamerey-Duval, *Mémoires. Enfance et éducation d’un paysan au XVIII$^{e}$ siècle*, Avant-propos, introduction, notes et annexes par Jean-Marie Goulemot (Paris: Le Sycomore, 19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被化約成再現它們的論述。[76]有鑑於此，夏提埃才在〈庶民的挪用：讀者和他們的書〉（“Popular Appropriations: The Readers and Their Books”, 1995）一文中提出四種研究其再現的路徑和材料：一是圖像所再現的閱讀情境，和那些受最多讀者閱讀的讀物；二是在記敘性的文本或是銷售給庶民大眾的範本、曆書中有關閱讀和書寫實踐的規範性再現；三是在銷售給庶民大眾的書籍中，編排和印刷等物質形式對於庶民讀者之閱讀能力和期待的暗示性再現；第四種是庶民讀者在其自傳性寫作中，對自己閱讀經驗的再現，或是在教士、異端審判者等威權要求下，對自己讀過的書籍、獲得的管道和方式，以及理解過程的再現。[77]

在以庶民大眾為訴求的文本和書籍為研究材料的實作基礎上，夏提埃對於「什麼是閱讀？如何重構古時的閱讀？」這個既是認識論也是方

76 對於夏提埃而言，論述是一種實踐活動，稱其為discursive practices（*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p. 11），但不是所有的實踐活動都為論述的形式。借鑒瑟鐸、布厄迪（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對文化實踐概念的討論，以及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對「論述性構成」（formations discursives）和「非論述性系統」（systèmes non discursifs）所提出的區別，夏提埃強調，即使史家只能通過論述文字對於過去實踐活動所做的再現，得以認識之，卻不能把支配論述實踐的語言性邏輯等同於論述所再現的對象，如讀者的閱讀，在實際生活場域中進行的實踐活動時運作的邏輯。有關他與美國學者針對論述和實踐之區別的討論，參見Jonathan Dewald, “Roger Chartier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1:2 (Spring 1998, Seattle), pp. 221-240; William H. Sevell Jr., “Language and Practice in Cultural History: Backing Away from the Edge of the Cliff,”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1:2, pp. 241-254; Roger Chartier, “Writing the Practice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1:2, pp. 255-264.

77 Roger Chartier, “Popular Appropriations: The Readers and Their Books,” in *Forms 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p. 93-94。此文最早以 “Popular Culture: A Concept Revisited” 為題，發表在*Intellectual History Newsletter*, 15 (1993, Boston), pp. 3-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論的問題進行理論性的檢討。[78]其中〈讀者社群〉（“Communautés de lecteurs”, 1992）一文，[79]是以瑟鐸的「讀者如旅人、如偷獵者」之喻，作為全文引言，這樣的安排最能呈現夏提埃對於此雙重問題所新展開的對話關係：

> 作家就如同一個在其專屬之地上的奠基者，是語言土壤上過往勞役者們的繼承人，如鑿井者、如屋舍的建造者。與作家很不同的讀者則如旅人，他們在別人的土地上游走，又像是游牧者，穿過不是他們所書寫的田園上偷獵、占奪埃及的財產並享用之。書寫日積月累，藉由一個地方的建制來抵抗時間的磨損，又透過再生產的擴張而繁殖其產品。閱讀卻沒有任何憑藉以抵抗歲月的磨損（遺忘自己，也被人遺忘），它根本不會或很拙劣地保留自己所獲得的，然每一處它經過的地方都是失樂園的重複。[80]

筆者認為，夏提埃在嘗試將瑟鐸定義的讀者為偷獵者的「閱讀戰術」、逃逸於文本控制的閱讀實踐，納為研究對象之後，以一種新的認知，為閱讀史研究提出另一種可能的路徑。就在於瑟鐸所指陳的閱讀實踐之書寫的不可能性，他所提示的閱讀實踐的歷史研究，勢必是一種對「在場的缺席者」的研究。對於夏提埃來說，閱讀實踐史不是僅為把每一個讀者的獨特閱讀經驗蒐集起來，或是封閉於強調經驗與經驗之間的不可化約性。那麼，閱讀實踐史要問的並能操作的，便是識別在每一個時期和

78 如Roger Chartier, “Du livre au lire,” in *Pratiques de la lecture*, sous la dir. de Roger Chartier et à l’initiative d’Alain Paire (Paris: Éditions Payot et Rivages, 1993; 1ère éd.: 1985), pp. 62-88; Roger Chartier, “Texts, Printing, Readings,”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ynn Hun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54-175.

79 Roger Chartier, “Communautés de lecteurs,” in *L’Ordre des livres. Lecteurs, auteurs, bibliothèques en Europe entre XIVe et XVIIIe siècle* (Aix-en-Provence: Éditions Alinea, 1992), pp. 13-33.

80 引文取自Michel de Certeau,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I, Arts de faire* (Paris: Gallimard, 1990), p. 2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每一個社會的環境中，讀者或讀者社群是受何種共享的閱讀方式所形塑；[81]分析讀物的文本性和文本的物質性這些形構閱讀的程序和建制為何，讀者的社會身分（年齡、性別和社群屬性）和文化資源為何。正是在這些程序和建制中，讀者把讀物挪為己用、賦予文本意義，也是他們個別或所屬的社群所持有的閱讀能力、習慣和共享的價值，限定了閱讀實踐的差異特質，以及他們對其閱讀實踐的書寫式再現。

「最常見的情形是，書籍使用的唯一線索就是書籍本身。這點造成閱讀史的嚴重限制，但也成了它絕對的吸引力。」（Le plus souvent, le seul indice de l'usage du livre est le livre lui-même. De là, les sévères limites imposées à toute histoire de la lecture. De là, aussi, son impérieuse séduction.）[82]夏提埃從認識書籍計量史忽視讀者對讀物之操作，到體認閱讀實踐的釋析須參照其社會性和物質性的特質和條件，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並不像達頓依循金茲伯格的模式，找尋讀者內在閱讀經驗的「直接」證據。[83]筆者認為，不僅因為證據稀少，更在於他以瑟鐸的「閱讀的絕對性」概念提醒歷史學家，任何以書寫形式表現的閱讀經驗進入再現系統時，需要檢驗寫作者的寫作動機、陳述對象、寫作策略、期待的閱讀效果等溝通情境所產生的意涵。由夏提埃主編的《印刷的使用》（*Les Usages de l'imprimé*, 1987）一書，即是採取印刷實物之案例研究的方式，專注於重構印刷物的使用所連結的社會和政治脈絡、在文本和圖像中的再現，以及在印刷物的編排等物質形式的再現。[84]

---

81 夏提埃也以Stanley Fish所提出的「詮釋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稱之。請參閱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82 Roger Chartier, "Du livre au lire," p. 87.

83 Robert 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p. 215-256.

84 Roger Chartier, "Avant-Propos. La culture de l'imprimé," in Roger Chartier, dir., *Les Usages de l'imprimé*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7), pp. 7-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夏提埃在進行探索閱讀史的過程中，曾面對諸多矛盾或緊張的關係：如文本的全面控制與讀者的絕對自由；在場的書籍和文本與缺席的真實讀者；閱讀行為的社會性與獨特的閱讀經驗等。在他提出的理念原則和可行的分析步驟與方法中，英美書目學的應用，特別是麥肯錫所提出的「文本社會學」，使得書籍等印刷物之讀者的閱讀史發展成一種把閱讀問題置於研究核心的書寫文化史。[85]我將從法國學界接受英美書目學的脈絡，理解馬爾坦和夏提埃在編寫《法國出版史》之後，如何以各自的閱讀史關懷觀點，轉向於包涵印刷物等的書寫文化史研究。

## 四、書目學、文本社會學與書寫文化史

傳統英美書目學將書籍視為物品來研究，強調鑑別印刷文本，必須嚴謹重建它在印刷坊的排版和印刷程序，並對載負文本之書籍的不同版本和印冊的物質特徵進行描述與分析。書目學訓練的這套研究技術最初是針對古典文本，用以比較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戲劇著作的不同版本，以求能對保存到當代的每一印刷版本建立最完整和精確的認識，進而建立版本系譜，終能獲得由劇作家本人親筆撰寫或口傳的最正確文本。此種對印刷文本的物質研究，在二十世紀 70 年代初期，因科索普（Wallace Kirsop）和羅費爾（Roger Laufer）的引介，而以「實物書目學」（bibliographie matérielle；physical bibliography）之名，

85 這樣的研究傾向已呈現於《印刷的使用》書中，也就不同於其他找尋讀者留下的閱讀紀錄的研究，如書寫在書籍文本的邊緣、書頁空白處的眉批，或是學習者的作業本等。Anthony Grafton and Lisa Jardine, *From Humanism to the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 in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H. J. Jackson, *Marginalia: 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2001); Stephen Colclough, “Procuring Books and Consuming Texts: the Reading Experience of a Sheffield Apprentice, 1798,” *Book History*, 3 (2000, Pennsylvania), pp. 21-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登陸法國學界。[86]

夏提埃和賀許在〈書籍：一個視野的改變〉文中，即是循著這些引介英美書目學的專文，[87]以及麥肯錫研究劍橋大學出版事業歷史的論文，[88]設想在未來的書籍史研究中，可藉助此學科的技術，以鑑別盜版書和禁書，重建印刷坊中排版印刷等工作者活動的歷史。不過，由於書目學僅單純分析和描述印刷符號特徵，而不處理符號之社會意涵和象徵意義，夏提埃和賀許在當時並不認為此學科對於書籍史的文化面研究有任何啟發。[89]直到美國學者賽恩格（Paul Saenger）為《法國出版史》第一冊撰寫〈中古時期閱讀的方式〉（“Manières de lire médiévales”, 1982），才有所改觀。[90]在這篇論文中，賽恩格透過書寫組織和文本編排的形式，重建從口語的、發聲的，到視覺的、默讀的閱讀方式之歷史演變。此時才讓已經開始思考書籍之閱讀和使用的法國學者，重新重視研究文本物質特性的考證學科，如實物書目學所提供的分析方法。[91]

相較於夏提埃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之際，朝向探詢書籍的「接受端」——即讀者的閱讀實踐歷史和方法，馬爾坦在思考閱讀的問題上，則傾向從「發射端」——即從文本和書籍的物質形式了解閱讀的建制和形塑工作。他在這段時期最早的研究成果是發表於 1977 年的〈朝向一種閱讀

86 Wallace Kirsop, *Bibliographie matérielle et critique textuelle, vers une collaboration* (Paris: Lettres modernes, 1970); Roger Laufer, *Introduction à la textologie* (Paris: Larousse, 1972).

87 特別是Roger Laufer, “La bibliographie matériell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critique textuelle, l’histoire littéraire et la formalisation,”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Méthodologies*, septembre-décembre (1970, Paris) pp. 776-783.

88 D. F. Mckenzi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96-1712,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89 兩位作者參考的另一本書目學作品為Philip Gaskell, *A New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90 Paul Saenger, “Manières de lire médiévales,” in 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 Le livre conquérant. Du Moyen Âge au milieu du XVII^e siècle*, pp. 147-161.

91 其他考證文本物質特性的學科包括古文書學（paléographie），以及專以手抄書為研究對象的經卷學（codicologi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歷史〉（“Pour une histoire de la lecture”）。[92]此篇論文從希臘時代莎草紙（papyrus）製的捲軸書（volumen），到西元二世紀後出現的羊皮製的翻頁式手抄書（codex），再到印刷術製作的書籍間長期的演變，說明在閱讀中身體如何受制於不同物質形式的書籍以及文本的書寫方式和編排組織。他指出，捲軸書不利於讀者在閱讀進行中對照前後文，而希臘、羅馬時期讀者面對連續書寫的文本，既無斷字和句讀，也沒有間隔和段落，於是發展出高聲朗讀或發聲閱讀的習慣。賽恩格以同樣的視角，對於馬爾坦所解釋有關印刷書之前的中古手抄書形式演變的部份，更詳細地加以舉證。他說明斷字的書寫形式最早出現在七世紀英格蘭和愛爾蘭的修道院，至九世紀到十一世紀之間，歐洲各地的修道院因使用斷字書寫，才逐漸以靜聲抄書取代發聲抄書；默讀的行為則在十三世紀從歐洲大學普及開來，並在一個半世紀之後擴及至貴族讀者群。[93]

《法國出版史》這部四冊的集體之作，把書籍史的研究視角從生產和出版事業擴展至書籍等印刷物的形式和使用。[94]也讓在分析印刷文本中的視覺空間、[95]口語閱讀之歷史演變上卓有貢獻的英美書目學，在法國學界有了更廣泛的知名度。由於學者在書籍史研究上的交流，麥肯錫為傳統定義的書目學賦予「文本的社會學」的新意涵中，把法國書籍史重視經濟與社會面向的長處納入研究範圍：「書目學是一門既研究文本

92 Henri-Jean Martin,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lecture,”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u livre*, 16 (1977, Bordeaux), pp. 583-610.

93 作者以此主題發展的專書為Paul Saenger, *Space between Words: The Origins of Silent Read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4 夏提埃在第一冊和第二冊各發表兩篇有關書籍之閱讀和使用的專文。除了已在本文第三節中提及和分析的三篇，另一篇為“Pamphlets et gazettes,” in 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 Le livre conquérant. Du Moyen Âge au milieu du XVII^e siècle*, pp. 501-526.

95 Roger Laufer, “L’espace visuel du livre ancien,” in 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 Le livre conquérant. Du Moyen Âge au milieu du XVII^e siècle*, pp. 579-601, 以及 “Les espaces du livre,” in 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pp. 156-1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被保存的型態，也研究它們從生產到接受的整個傳遞過程。」[96]他並以《法國出版史》為模範，要求書目學不能停留在格里格（Walter W. Greg）或包爾威斯（Fredson Bowers）等學者的認知，僅把該學科定義為一種研究文本版本和描述印刷符號特徵的純科學。[97]相較於正統書目學的觀念和做法，麥肯錫的文本社會學則是把文本的概念和範疇延伸於非書形式的書寫物，及非文字的視覺、口語、數位化文本，並指出讓文本能夠被閱讀、被聽見的物質形式，不僅傳達也建構了意涵。在書籍文本的研究上，他強調要了解文本在生產過程中，不同施為者，如作者、繕寫員、編者、插圖師、印刷工、排字工、校定員等，「人之因素」的處理和操作。故文本的物質形式，如書籍的開本、段落和章節的切割以及編排設計，都是作者或出版者用以表達意涵的方法，並影響讀者的閱讀與接受。

《法國出版史》成為法國書籍史研究「轉型」成功的標誌，表現在麥肯錫對《法國出版史》的贊同，及此後一系列在西班牙、英國、美國、義大利、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史學界以此為模式進行的研究。其成果不僅在於費夫賀和馬爾坦在《書籍的出現》中所開啟，取徑於從經濟面向、出版業者的社會面向和管理書業的政治面向去研究書籍史的有效性；而是書籍在社會中的「文化作用與影響」之問題，在新概念和新方法的實踐之下，使得書籍史研究不再自限於計算書籍總量、分類書名或是調查私人藏書的社會分配。依循上述脈絡，我們方能了解，何以《書籍百科辭典》的編輯群會以書籍的三稜鏡——生產、發行和接受，體現「整體史」的理念，並藉助其他國家地區發展的研究，嘗試建立更寬廣的世界書籍史視野。

---

96 D. F. McKenzie, “The Book as an Expressive Form,” in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First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1986), p. 12.

97 Walter W. Greg, “Bibliography－an Apologia,” in J. C. Maxwell, ed., *Collected Pap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Fredson Bowers,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Critic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麥肯錫的文本社會學也同樣在法國學界產生共鳴。特別是在《法國出版史》之後，馬爾坦和夏提埃均從各自的閱讀史觀點和取向，強化文本概念和物質形式意涵的研究方向，思考和研究書寫文化史。麥肯錫對於文本概念的反省，不僅連結了過去至今的歷史現象，即人們從來不是只有閱讀書籍形式的文本，還有地圖、樂譜等，或是毛利人（Maori）傳統裡對於地理景觀的閱讀，[98]也同時關係到一個現時性的特殊脈絡。現今圖書館所需要收藏、分類、保存和供大眾使用的對象，不再像過去只有紙本或各類的印刷物，還涵蓋錄音帶、電視節目、影片、錄影帶、數位化資訊等視聽傳媒。馬爾坦在 1988 年發表的《書寫的歷史和權力》（*Histoire et pouvoirs de l'écrit*）當中所作的反省，[99]也正是書籍史僅是構成「社會溝通交流歷史中的一個側面」（un aspect de l'histoire des communications sociales）。[100]對此反省的採納，也就說明《書籍百科辭典》的學者編輯群為何提出一種以社會溝通媒體為新視角和新方向的書籍史學。[101]

《書寫的歷史和權力》出版後，即獲得法蘭西語文學院（L'Académie française）頒發的古貝爾大獎（Grand Prix Gobert）。這是馬爾坦第一次從其專長的書籍史中，擴大研究面向，以更廣泛的書寫物和社會溝通關係的研究視角，重新衡量書籍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他以宏觀的角度，爬梳從上古的美索不達米亞的黏土板，到東亞中國的書寫文明，穿越西歐古希臘羅馬時期、中古時期、近代早期，乃至當代社會，考量其所生

98 D. F. McKenzie, "The Sociology of a Text: Oral Culture, Literacy, and Print in Early New Zealand," in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pp. 79-128.

99 Henri-Jean Marti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Bruno Delmas, *Histoire et pouvoirs de l'écrit*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1996; 1ère éd.: 1988). 英譯版：*The History and Power of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00 Henri-Jean Martin, "Histoire du livre," in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 t. II: p. 478.

101 在《辭典》出版之前，馬爾坦的學生Frédéric Barbier和Catherine Bertho Lavenir已合著了 *Histoire des médias: de Diderot à internet* (Paris: HER / Armand Colin, 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產和使用的各種書寫物和書寫物以外的溝通媒體。[102]馬爾坦以費夫賀的「心態裝備」思考書寫文化長期的歷史演變，所探詢的重點，不在於鑑別某一特定時期裡書寫物的接受者使用或閱讀經驗的差異性。他所依持的觀點是：作為溝通媒介的書寫物和它的呈現形式，其中「書籍〔乃為〕書寫訊息最為完整的形式」（le livre, cette forme la plus achevée du message écrit），[103]形塑了人們思想和認識世界的方式。

這樣的觀點貫穿至他隨後專以書籍的形態學（morphologie）為觀察對象所做的研究，[104]即透過手抄書和印刷書的文本之書寫形式、編排和排版印刷的安置方式，[105]探究中古時期到近代早期歐洲社會中，書籍承載和傳遞的象徵意義，以及建構的溝通系統。茲以書寫符號（graphique）和空白的使用這兩個被馬爾坦視為法國在 1550 年到 1650 年間孕生之現代印刷書的特徵為例說明。十六世紀初傳至法國的羅馬書寫體，雖然出現在流傳於宮廷裡的抄本詩集，但哥德體仍為官方和宮廷社會使用的書寫體。印刷商或因正統勢力影響，或因經濟因素考量（哥德體較羅馬體節省排版空間），並未貿然採用新字體印書。直到法蘭西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1515 即位）欲以古羅馬文化繼承者的地位，強化他作為神聖羅馬皇帝候選人資格之政治策略中，羅馬體就承載了與支持哥德體的哈布斯堡王朝候選人之間權力較勁的象徵意義。在 1520 年到 1530 年之間，隨著法蘭西一世要求以羅馬體印刷古典作品的翻譯本，並在宮廷環境中形塑出一種新的閱讀時尚，法國的印刷書逐漸從哥德體轉變為以羅

102 馬爾坦自認為缺乏當代溝通媒體的專業知識，書中對於這部分的討論由Bruno Delmas執筆撰寫。

103 Henri-Jean Martin, “Préface,” in *Histoire et pouvoirs de l’écrit*, p. VI.

104 Henri-Jean Martin et Jean Vezin, dir., *Mise en page et mise en texte du livre manuscrit*, Préface de Jacques Moufrin (Paris: É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 Promodis, 1990); Henri-Jean Martin et collab., *La naissance du livre moderne, XIV^e^ -XVII^e^ siècle: Mise en page et mise en texte du livre française* (Paris: É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2000).

105 馬爾坦以「文本編排」（la mise en texte）/「書頁排版」（la mise en page）稱之。前者可廣義指涉手抄文本和印刷文本的書寫形式和編排方式，後者則專指印刷文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馬體排版的現代書籍形式。

至於章節和段落間空白處的使用，在馬爾坦看來，就如同字與字、句與句之間隔的使用，及相應發明的標點符號一樣，是一種讓思考視覺化（visualiser），而有別於歐洲「讀」書之人長期的口語式思考方式。不過，印刷書的空白使用，要到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十八世紀初才確定其普及性。像笛卡爾的《沉思錄》（*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在它 1641 年的拉丁文版本中，[106]一段起頭於第 7 頁的論述文字，一直到第 60 頁才出現下一個段落。另一例子為法國十七世紀沒落貴族出身的女作家德・史居德里（Madeleine de Scudéry）的十卷《克雷莉姬》（*Clélie*, 1654-1660）。[107]這套深受宮廷人士和城市的體面讀者喜愛的長篇歷史小說中，唯有當故事人物交換的信簡以排版的形式呈現時，才出現了與長達數十頁的前段內容做出區隔的空白空間。[108]

在《書籍的出現》問世四十年後，馬爾坦把自己在古籍文獻上原有的專業訓練和長期的研讀考證，結合於書目學的方法，賦予此書第三章〈書的呈現〉以「形式影響意涵」（forms effect meaning）的新意，[109]對費夫賀所提問的「書籍的文化作用與影響」，以完全不同於他在寫作「書籍酵素」時對此問題的處理方式，做出回應。馬爾坦在《書籍、權力與社會》中，雖然開啟法國書籍史以系列資料和計量方式分析「讀者是誰」、「讀什麼書」的問題，卻忽略了書籍實體的文化意涵。對於馬爾坦來說，這個新研究視角的實踐，更能呈現費夫賀的心態史觀依然是用來理解書

106 René Descartes,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Paris: M. Soly, 1641).

107 此書冠以其兄之名出版：Madeleine de Scudéry, *Clélie, histoire romaine, dédiée à Mademoiselle de Longueville, par Mr de Scudéry, gouverneur de Nostre Dame de la Garde* (Paris: Augustin Courbé, associé, pour les tomes VII à X, à Jean Blaeu à Amsterdam, 10 vols., 1654-1660).

108 德・史居德里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並非藉由一個全知的敘述者之言，鋪陳和交代故事情節的發展，而是利用一個接著一個的談天對話（conversation）場景中，透過男女人物之口，操作敘事。故依馬爾坦的假設，讀者若非發聲閱讀此書，很快的就在作者以眾多「他說」、「接著她說」，卻沒有段落的文字中混淆。

109 D. F. McKenzie, “The Book as an Expressive Form,” p. 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籍文化歷史長時期變遷的有效概念。[110]

夏提埃在其閱讀史研究中建構的文化史觀，和馬爾坦曾以其《書籍、權力與社會》參與並強化 70 年代的書籍史—心態史研究之間的差異，可由他以下的評論做一對照：「〔文化史〕優先參考個體性的應用方式，而非統計式的分佈結果；放棄預設文化模式與準則的有效性，而去思考它們在被適應接納時的各種特殊狀況；將社會大環境的再現亦視為能體現社會特色之各種差異性與對抗的構成部份。」[111]夏提埃卻也在其閱讀史研究的實踐中認識到，不論是特殊狀況抑或個別差異與對抗，都需要參照社會的規範性和限制性特質，也就是馬爾坦在形塑其閱讀和書寫文化史問題意識時所依持的費夫賀之「心態裝備」概念，才能加以識別與衡量。不過，相較於馬爾坦透過麥肯錫的「形式影響意涵」概念所提出的書寫文化史，依舊僅是單面向的著重在書寫物之於讀者的閱讀和思考方式的形塑力；夏提埃則以讀者對書寫物的使用，以及對文本賦予意義之所以可能的條件作為命題，從書籍等印刷物的讀者的閱讀史移向於書寫文化史的探索，並持續關注文化史中「流動的、不穩定的和具衝突性的構成」特質（construction mobile, instable, conflictuelle）。[112]

誠然，馬爾坦與夏提埃在向其他學科借鑒概念和方法，以突破計量書籍史的限制上，都強調英美書目學，尤其是麥肯錫的文本社會學，對於文本物質性的分析工作，助益甚大。必須釐清的是，當馬爾坦在使用 “la mise en texte”（文本編排）一詞時，所指涉的是文本書寫和編排的物質性；不同於此，夏提埃則謂之為 “la mise en page”（書頁排版）或 “la mise en livre”（輯訂成書）。他將 “la mise en texte” 保留於指稱作者意圖控制讀者做出最正確閱讀時所運用的寫作策略，包括利用社會或文學

110 馬爾坦在生前接受的訪談中，做了如此的肯定：Henri-Jean Martin, *Les métamorphoses du livre: Entretiens avec Jean-Marc Chatelain et Christian Jacob*.

111 Roger Chartier, “La nouvelle histoire culturelle existe-t-elle?,” *Cahier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Regards sur l’histoire culturelle*, 31 (avril 2003, Paris), p. 17. 此文已由巴黎第十大學藝術史博士生楊尹瑄翻譯，筆者校定。

112 Roger Chartier, “La nouvelle histoire culturelle existe-t-elle?,” p. 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面的約定成規，讓讀者對作品進行識別、歸類和理解，或以操作書寫風格、敘述方式等技巧，以期作品能讓讀者產生共鳴的最佳效果。[113]

上述夏提埃應用於解析文本所建構之社會再現的方法，取自於文學批評，特別是「接受美學」（Aesthetic of Reception）理論。達頓在〈朝向一種閱讀史〉（"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1986）一文中，把「接受美學」視為研究讀者閱讀之內在經驗和過程中可採用的取徑之一。[114]相較於達頓的肯定，夏提埃則從文本的物質性角度，指出此種取徑方式有其侷限之處。[115]姚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和伊薩（Wolfgang Iser, 1926-2007）從讀者反應（reader response）角度，思考文本意涵建構的歷史性。[116]但在夏提埃看來，他們專注於分析文本內部作者與讀者的相互作用，因此漠視了文本的接受情境會隨著文本物質形式的改變而產生變動。就像收錄於《藍皮文庫》的文學作品，出版商所設想的讀者取代了文本作者寫作之初所設想的讀者，在考量新讀者的閱讀能力之下，出版商對原始文本的內容長度和編排形式進行刪修。可以說，夏提埃從麥肯錫的「形式影響意涵」的概念中，為關注書籍和文本物質特性的必須性，找到理論基礎：「新讀者自然成就新文本，其新意涵乃是其新形式的作用。」（New readers of course make new texts, and their new meanings are a function of their new forms.）[117]

不同於過去計量書籍史家專注在統計與分類書籍標題，夏提埃則倚重文學批評的研究方法，用之於文本意涵的分析工作。但他也以閱讀史

113 Roger Chartier, "Du livre au lire," in *Pratiques de la lecture*, p. 79.

114 Robert Darnton,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179-185; First published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 23:1 (1986, Clayton [Australia]), pp. 5-30

115 Roger Chartier, "Du livre au lire, " in *Pratiques de la lecture*, p. 80.

116 Hans Robert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lation from German by Timothy Bahti, "Introduction" by Paul de M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Wolfgang Iser,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7 D. F. McKenzie, "The Book as an Expressive Form," p. 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研究成果，反省文學批評的閱讀理論。夏提埃借助文本社會學的觀點，並以閱讀行為中口說傳達文本的歷史事實，質疑詮釋學或現象學理論中，將文本視為自給自足的抽象狀態、抽離其得以傳遞或接受的物質脈絡。此外，口說傳達文本的閱讀行為，也讓夏提埃對馬爾坦在《現代書的誕生》（*La naissance du livre moderne*, 2000）中僅憑書籍和文本物質特性所提出的普遍閱讀文化模式，表示保留的態度。[118]根據他早先對於文本和圖像所再現的閱讀行為進行的研究，在「現代書」的成熟期，亦即印刷書中普遍使用空白的十八世紀，高聲朗讀這種以口說傳遞印刷文本的行為並沒有消失。同樣的，在沒有斷字斷句的古希臘羅馬時期，默讀的行為也存在於當時把文本與聲音、朗讀與聆聽的結合視為成規的社會。[119]是故，當夏提埃在反省書寫載體從捲軸書、翻頁書、印刷書，到二十世紀的電子螢幕書這個長期演變的歷史問題時，特別從書寫載體的物質形式和文本被閱讀的方式這兩個面向，檢驗史學工作對於書籍和閱讀文化所預設的普遍模式，諸如從手抄書到印刷書的革命、從精讀到泛讀之閱讀革命的有效性。[120]

夏提埃透過「形式影響意涵」的角度分析印刷文本，尤其是依循麥肯錫的模式分析歐洲近代早期的戲劇作品，他將其所關切的以口說方式接受和傳遞讀物的閱讀史問題，從研究文學著作、私人書寫以及圖像的再現，擴展至觀察口語性在印刷文本的表現形式。[121]夏提埃的閱讀史研

118 Roger Chartier, "Comptes Rendus. Henri-Jean Martin, *La naissance du livre moderne. Mise en page et mise en texte du livre français (XIV^e et XVII^e siècles)*, Paris: É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99, 494p.,"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Pratiques d'écriture*, n. 4-5 (juillet-octobre, 2001, Paris), pp. 1029-1030. 按：《年鑑：經濟・社會・文明》期刊自 1994 年起更名為《年鑑：歷史・社會科學》（*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19 所根據的學者研究，如Jesper Svenbro, "La Grèce archaïque et classique. L'invention de la lecture silencieuse," in Guglielmo Cavallo et Roger Chartier, dir., *Histoire de la lecture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7), pp. 47-77.

120 Roger, Chartier, "Les représentations de l'écrit," in *Culture écrite et société. L'ordre des livres (XIV^e -XVIII^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S.A., 1996), pp. 17-44.

121 Roger Chartier, *Publishing Dram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經驗，成為他在〈近代早期的書寫文化與文學〉（“Culture écrite et littérature à l’âge moderne”, 2001）一文中，[122]和其他研究書寫與社會關係的學者展開對話的基礎。

2001 年 10 月，《年鑑》期刊發行「書寫實踐」（Pratiques d’écriture）專號，收錄了由夏提埃主持，2000 年 8 月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辦的「從上古到當代書寫和閱讀的社會實踐」國際研討會中，有關中古時期到十九世紀的研究論文。《年鑑》主編在序言中表示，這些論文是在「受閱讀史滋養下，以及受書寫符號的文化（culture graphique）概念的啟發下，試圖從社會實踐的角度辨識過去社會之中書寫物所處的位置」。[123]夏提埃為此專號第一單元「一種書寫文化史」所寫的〈近代早期的書寫文化與文學〉一文中，說明架構此研究領域所憑藉的「諸史學系譜」（filiations historiographiques），特別是閱讀史和書寫符號的文化研究。事實上，我們看到夏提埃在文中試圖提出的，更是一種超越兩者之區隔的書寫文化史。

夏提埃在該論文中提到，佩托西（Armando Petrucci）等義大利學者及西班牙學者在其傳統的古文書學基礎上，建立了書寫物的生產和實踐的歷史研究。他們所謂的「書寫符號的文化」，是指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地區裡，所有的書寫物以及形塑它們的實踐活動。在此概念下，南歐學者們致力了解存在於不同實體形式的書寫（如手抄本、碑銘、繪圖、印刷書）之間的關聯，並梳理這些書寫實物在多樣的使用面向中（包括政治的、行政的、宗教的、文學的和私人性質等），如何以其各式的物質特性產生意義和作用。[124]雖然夏提埃也說明了這些主要研究上古和中古時期的南歐學者，在把書寫史轉向關注書寫使用史的過程中所採用的

122 Roger Chartier, “Culture écrite et littérature à l’âge modern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Pratiques d’écriture*, n. 4-5, pp. 783-802.

123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Pratiques d’écriture*, n. 4-5, p. 781.

124 Roger Chartier, “Culture écrite et littérature à l’âge moderne,” p. 7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方法，[125]但他在此篇以西方近代早期社會為探究範圍的文章中，並沒有進一步討論這些方法對於此時期書寫活動的社會脈絡和書寫材料分析上的適用性或啟發性。這篇文章在方法論上所點出的重要反省命題在於，閱讀和書寫的區分，不僅是西方近代早期社會識字教育上的特徵，也同時表現在當代歐美史學研究上閱讀史和書寫史的彼此區隔。例如，從書籍史延伸出的閱讀史，專注於出版品（手抄和印刷）文本的閱讀問題，而忽略歷史上其他形式的書寫物。

有鑑於此，夏提埃提出從文學與平常書寫實物及活動之互動關係，著手研究的書寫文化史。這種研究，不只在文化實踐的概念上，在對書寫的文本意涵和文本的物質性的分析上，與閱讀史研究是互通的，它也必須關注歷史上口語和書寫相互作用的關係，不論是書寫文本透過口說傳遞的閱讀行為，還是口語性在書寫表達上或印刷形式上的呈現。夏提埃在 2005 年發表的《銘刻與抹滅：11 世紀至 18 世紀書寫文化與文學》（*Inscrire et effacer: culutre écrite et littérature [XI^e^-XVIII^e^ siècle]*），即是根據他長期對於自身所屬的史學領域和其他專事文本研究領域之限制的觀察與反省工作，以及上述方法論觀點所寫成的專書。[126]在各篇以特定文學作品作為案例的研究中，夏提埃不僅借用「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的文學批評角度，[127]分析作者對書寫、印刷等相關物件和實際活動進行美學效果的挪用以及象徵意涵的建構，也同時對文學作品再現的這些對象，進行歷史的考證研究。

夏提埃所定義的書寫文化史不僅納入了閱讀史的問題關懷、概念工

125 譬如採用形態學來研究書寫的某一特定類型，像是位於公共建築內外、屬於紀念性或展示性的書寫；對於那些不是依其形式而是依其功能而被界定範疇的書寫，如為讓生者永久紀念死者的各種書寫，則採類型學（typologique）的途徑分析之；或是用微觀史學的方式來重構特定場址中所有能被識別的書寫痕跡和證物。

126 Roger Chartier, *Inscrire et effacer: culutre écrite et littérature (XI^e^-XVIII^e^ siècle)* (Paris: Seuil / Gallimard, 2005).

127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具和方法途徑，同時也被期待能夠就此突破由書籍史延伸出之閱讀史的研究盲點。在〈作者的諸形象〉（“Figures de l’auteur”, 1992）[128]和〈保護關係和題獻〉（“Patronage et dédicace”, 1995）[129]二文中，夏提埃即探討了過去書籍史所忽略的作者問題，作者的身分在中古到近代這段時期之建構過程，包括作者之名的出現和使用、查禁政策的刑事責任、著作權的概念形塑，以及作者們在印刷市場經濟和傳統保護關係之間受限的自主性與運作的協商策略。深具閱讀經驗，並以出版的書寫文本展現其閱讀之踐履性行動的作者、編者，卻在閱讀史研究對象的界定下，不被置於「讀者」的位置。從書籍史延伸出的閱讀史，關懷焦點為書籍等印刷物的讀者之閱讀實踐。筆者在本文中已指出，法國傳統書籍史雖沒有忽略其所研究之書籍的讀者（諸如探詢讀者是誰、讀什麼，以及如何取得、在哪裡讀等問題），卻未及思考讀者如何閱讀的問題。就此對於閱讀此實踐活動的歷史考察中，史家們關心的不僅是讀者對讀物的使用和閱讀方式（如發聲的或靜默的、獨處的或社交性質的閱讀行為和習慣），更企圖探詢讀者如何挪用與詮釋所讀之物、賦予文本意義。夏提埃則透過自身研究經驗以及借鑒的概念和方法，把讀者如何賦予文本意義這個閱讀史研究上至關重要、卻棘手處理的問題，轉移為思考此挪用實踐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分析的途徑主要是從特定的書籍與文本之物質形式著手，藉此劃定出作者或是出版商設想的可能讀者社群，進而釋析文本與讀者社群的各種關聯性。

在閱讀史研究的基礎上，書寫文化史可能的突破，當不止於納入書籍等印刷物以外的書寫物、考察其讀者或使用者與它們的關係。它可以把歷史上的閱讀實踐者，從上述史學發展下的閱讀史所專注的「在場的缺席者」，擴及至深具閱讀經驗的作者與編者、文學評論者與記者等「在

128 Roger Chartier, “Figures de l’auteur,” in *L’Ordre des livres. Lecteurs, auteurs, bibliothèques en Europe entre XIV^e^ et XVIII^e^ siècle*, pp. 35-67.

129 Roger Chartier, “Patronage et dédicace,” in *Culture écrite et société. L’ordre des livres (XIV^e^ - XVIII^e^ siècle)*, pp. 81-1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場的『非』讀者」。誠然，讀者對所讀之物賦予意義的實踐遠非僅以書寫形式呈現。但除非我們摒棄閱讀史對於讀者具生產、創造意義的能力的設想——儘管此能力受到文本設下的閱讀程序和建制等等限制，付梓印行的書寫文本終究為考察作為讀者的作者、編者之閱讀實踐的重要材料。在書寫文化史研究開展之際，強調作者、編者作為讀者的閱讀經驗，[130]也就非回歸於抽離文本物質形式、忽略文本與其設想讀者之關聯性的傳統文本研究。筆者將依循夏提埃對書寫文化史所作的定義和對閱讀史的反省脈絡，以法國近代早期的婦女書寫活動為例，從書寫文本為閱讀實踐的一種表現形式的角度，來觀察她們之中作為讀者的作者。

研究歐洲近代早期婦女書寫實踐的學者有一共同體認：在歷史上，人為的規範總是會受到挑戰。此時期由教會主控的識字教育，依教育目的和性別差異原則，區分出「閱讀」和「書寫」的學習，婦女被歸類和規範為僅能接受閱讀教育。但留存至今的女性私人帳本、曆書空白處的留字、日記、信簡、自傳、回憶錄等書寫資料，卻說明了女人和其他社會底層庶民都曾僭越規範，她們的能力超越僅能閱讀的限制，而進入書寫者、甚至作者之列。[131]這些婦女書寫實踐的歷史，不僅讓我們認識到書寫者以其書寫所展現的越／閱讀行為，最重要的是，作為讀者的作者，透過書寫以表陳其挪用的閱讀活動，參與的社會再現之競爭。

---

130 在夏提埃和Guglielmo Cavallo主編的*Histoire de la lecture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一書裡，Anthony Grafton以人文主義學者為對象，分析其閱讀的物質環境。此外，John Kerrigan以文藝復興時期的出版品探究「作為讀者的編者」。John Kerrigan, “The Editor as Reader: Constructing Renaissance Texts.” In James Raven, Helen Small and Naomi Tadmor, eds. *The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2-124.

131 從出版史的角度觀之，法國近代早期婦女所從事的書寫活動，許多是像Madame de Sévigné死後因個人的書信集被出版，又受書信文學評論者的賞析和介紹，才成為「作者」、「書信家」。這裡所區分的「書寫者」和「作者」，是把「作者」指稱那些生前即從事出版活動，即使受制於性別或所屬社群規範而以匿名或假名出版作品的婦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女性書寫者從事的友道論述為例。[132]就題材和文類而言，「友道」在西方思想論述和寫作文化傳統上，是專屬於學者之務。從十七世紀以降，在貴族被君王家僕化的政治環境中，這個社群的女人首次擁有了將此男性論述傳統挪為己用的空間，包括在沙龍聚會裡，與友人談話發抒己見，付諸書寫，傳抄於圈內人，也以印刷書的形式出現在文學公共場域。然而，細論同時期作品中表達友道的方式，男性作者不僅引用古典哲學家之名，以闡述友誼概念，還在作品下方腳註處補充拉丁和希臘原文；相較於此，逾越性別本分，論述友誼的女性作者，卻不容許自己的表達方式被標上「女學究」的污名。前述之女作家德．史居德里，從標題的選擇上，就以〈友誼的故事和會話〉（“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133]區別於〈論友道〉的體例。為了合法化對友誼論述知識的據用，德．史居德里選擇貴族社交的談話（conversation）作為敘事形式，刻劃男女友人文雅有禮的對話姿態，並安排人物從談及愛情為何的閒聊中，引出友道議題。

獲得君王家族成員保護的德．史居德里，在她的書寫中，首要之務在於和她的保護主以及她自身所屬的貴族社群讀者建立溝通關係。雖然她筆下的男女人物都謹守貴族社交談話不得如學究般引經據典的戒律，不過，一旦關係到友道論述的哲學傳統，諸如亞里斯多德的德性之友、逸樂之友和利益之友的區分概念，德．史居德里就透過男性之音，使用間接引述方式闡述：「有一位古代哲學家如是說……。」透過小心翼翼的佈局安排，她把傳統友誼概念「現代化」和「女性化」，於談話場景中主要扮演發問者的女主角，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中，以其行動展現德行之友的典範價值。如此既有別於廷臣間爾虞我詐的爭寵行徑，也不同於

132 請參閱筆者博士論文第三章，Man-Yi Chin, “*Memoria* de l’“amitié savante,” son appropriation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la contribution des femmes du monde,” in *Amitié féminine et écriture épistolaire au XVIII[e] siècle* (Thèse de doctorat, l’EHESS, 2004), pp. 208-304.

133 Madeleine de Scudéry, “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 in *Conversations morales, dédiées au Roy*, tome II (Paris, sur le Quay des Augustins, 1686), pp. 871-10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那些對友道侃侃而論，自己卻身為損友的男性角色。

若接受夏提埃所建議的須開發閱讀史和書寫史的互通性，或者超越彼此之區隔的可能性，在此必須提出的問題是：作為讀者的作者，他（她）如何在選擇的書寫類別中，在表達情感和闡述意念的論述實踐中，將社會形塑和傳承的寫作成規、論述形式、知識傳統、常識、價值觀念等據為所用。上述分析之例說明，文本所提供的閱讀訊息，不僅僅作為理想讀者的正確閱讀程序，亦含有作者自己的挪用式閱讀。如夏提埃所提醒的，讀者的閱讀有其形塑條件的限制，包括讀者的智識能力，與所屬社群共享的價值理念。德・史居德里則是在她和設想之讀者間所建立的溝通關係中，衡量如何合乎禮儀地呈現自己的挪用式閱讀。

文本社會學讓我們得以從文本編排的物質形式，來檢視文本和讀者的溝通關係上的轉變。當上述德・史居德里在〈友誼的故事和會話〉發表的友道論述，被收錄在 1766 年出版的《德・史居德里小姐的精神菁華》（*Esprit de Mademoiselle de Scudéri*）時，[134]其間所展現出新的溝通關係，不僅表現在編者所撰〈致讀者的話〉，也顯示在文本的編排上：刪去原來文本中的故事情節和談話情境，僅擷取出談話場景中的問答，作為新文本的形式。十八世紀中葉之後，有教養的讀者們仍舊嚮往路易十四時代及當時的文藝活動，故對出版商而言，夙負盛名且作品暢銷的德・史居德里仍具有市場吸引力。但一個世紀之後，即使讀者仍能理解這位殷勤、文雅有禮的女作家在其著作中所論述和宣揚的倫理價值，卻不會再與她透過談話情境等營造的殷勤書寫風格產生共鳴。

從法國出版品的歷史觀之，此種擷取作家「精神菁華」，正是十八世紀的編者和出版商用於出版古典作品或當代知名作者作品的方式。透過此方式，書籍業者得以創造新的讀者，或是重新吸引具此類文學素養的讀者們。但是「作為讀者的編者」，事實上也透過致讀者的文本和其所採用的編輯方式，呈現出他對德・史居德里作品的閱讀意見和操作，

134 Madeleine de Scudéry, *Esprit de Mademoiselle de Scudéri* (Amsterdam et Paris: Philippe Vincent, 17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其〈致讀者的話〉所云：「德・史居德里小姐在她小說中再現的女人，是她們應該要有的樣子；如今我們的小說卻再現她們的原樣。」[135]

「閱讀總是在閱讀些東西」，[136]夏提埃以這句陳述，把瑟鐸所宣示的「逃逸於文本絕對控制」的閱讀概念，移轉到認識讀者對於讀物的挪用，其實是受限於讀者自身或所屬社群的閱讀能力，以及讀物透過文本佈局和物質形式設下的閱讀程序和建制。筆者則從作為讀者的作者、編者的角度，探詢他們在從事或介入文本寫作和編輯形式中，如何與其所訴諸的讀者群建立溝通關係，以及展現自身的閱讀實踐。本文著重分析的是從馬爾坦和夏提埃在跨國界和跨學科之學術交流中的接受和回應，以了解他們如何在書籍史既有的研究基礎和各自的問題關懷下，思考和研究閱讀史。故這裡指出他們從書籍史延伸出的閱讀史研究忽視作為讀者的作者、編者，目的並不是要以閱讀史整體研究的位置，[137]來比較出他們所未處理過的材料、未及關心的對象或是未採用的理論。[138]相反的，筆者是把他們對於閱讀史所進行的方法論反省和實踐用之於分析為讀者的作者、編者，以及其印刻在書籍與文本中的閱讀訊息。透過這個檢驗工作，除了回應夏提埃對書寫文化史研究所要求的開發閱讀史和書寫史的互通性，也期待書寫文化史將更能藉由它據為所用的文本分析、文本

135 Madeleine de Scudéry, *Esprit de Mademoiselle de Scudéri*, p. VI.

136 Roger Chartier, “Communautés de lecteurs,” p. 17.

137 關於歐美閱讀史研究現況的介紹和評論，可參閱Leah Price, “Reading: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Book History*, 7 (2004, Pennsylvania), pp. 303-320; Ian Jackson,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Readers and Read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7:4 (2004, London), pp. 1041-1054。以及已經成為經典的論文集：Roger Chartier, dir., *Histoires de la lecture: Un bilan des recherches, actes du Colloque des 29 et 30 janvier 1993* (Paris: IMEC Édition /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5).

138 譬如女讀者史和閱讀的性別研究：Isabelle Brouard-Arends, dir., *Lectrices d’Ancien Régim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3); Kate Flint, *The Female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lizabeth A. Flynn and Patrocinio P. Schweickart, *Gender and Reading: Essays on Readers Texts, and Context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社會學的書籍史，以及強調實踐研究的文化史，幫助我們認識和研究歷史上人們所從事的文學寫作，或是表達的思想理念和心態情感等聯繫於書寫與閱讀的文化活動。

## 五、結語

90 年代以來，許多學者積極架構西方書籍史研究和中國書籍史研究，試圖在歷史知識和史學方法論方面建立對話橋樑。[139]2005 年，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在她和周啟榮（Kai-Wing Chow）合編的《明清中國的印刷與書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書中，其序言以〈關於中國的書籍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為題，即根據中國版本學、目錄學和印刷術史等書籍研究的傳統，以及明清書籍歷史特殊的政治和社會文化情境，反省西方書籍史家提出的概念和取徑，在用之於中國書籍史研究時的適用性和侷限。[140]這種根據學科自身傳統和研究者的問題關懷，以回應與挪用其他學術研究的經驗，也存在於西方書籍史的研究社群中。如果書籍史既從其研究的對象，又同時從其採取的視角和方法來定義自身，本文則以馬

139 如*Late Imperial China*在 1996 年的專號 "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June 1996)，邀請夏提埃寫序（"Gutenberg Revisited from the East," pp. 1-9）。透過賈晉珠（Lucille Chia）、包筠雅、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啟榮和Catherine Belle 五位史家為專號撰寫的論文，夏提埃在序文中嘗試從比較史的視角評估西方書籍歷史和中國書籍歷史在出版技術和策略、文本流通和使用方式的差異，以及各自的特殊性。周啟榮在其著作*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也運用中西比較史指出歐洲中心主義觀點的謬誤，以及明清中國書籍文化和出版活動的特殊性。此外，中國大陸在 2005 年 10 月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行「中國和歐洲：印刷書與書籍史（8 世紀／15 世紀-20 世紀）」中法雙邊學術討論會。

140 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3-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爾坦和夏提埃在書籍史既有的研究成果和認定的研究模式之下從事的閱讀史為例，說明法國學者對於書籍史定義的反省和再形塑工作，實則表現在他們於跨學科和跨國界的學術交流過程中所做的接受與回應。

費夫賀以「整體史」的理念和要求，前進探索書籍史這塊「未知之地」。在他和馬爾坦合作撰寫《書籍的出現》時最感棘手，是如何檢驗他對印刷書之於社會的「文化作用與影響」這個含有文化史關懷的提問。從《書籍的出現》到《書籍、權力與社會》，我們看到馬爾坦在參與 1960 年代計量書籍史研究時，接受了當時年鑑史學社群以特定時期之整體印刷書出版為考察對象，來認識社會成員集體心態的觀點。這種心態史觀和書籍史研究採用的統計方法，在遭受年鑑學派內部成員和其他歐美學者的質疑和批判之際，為其辯護的夏提埃等書籍史家，終究接受關於讀者和其閱讀問題上的批評，而對書籍史展開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反省工作。

另一方面，馬爾坦的研究工作並不是像芬可史丹和麥克克里利（David Finkelstein & Alistair McCleery）在 2002 年合編的《書籍歷史讀本》（*The Book History Reader*），[141]以及 2005 年合著的《書籍歷史介紹》（*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中所呈現的，[142]就此停格於 1970 年代。[143]馬爾坦在《書籍、權力與社會》這部被認為是法國計量書籍史代表作中，以讀者「是誰讀什麼」這個問題，讓閱讀成為法國書籍史研究中的一個視點。那些位居此問題「邊緣」位置的觀察和假設，如「私

141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e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repr. 2006)。這本以英美學界角度來介紹當代歐美書籍史學的教本工具書，國內學者已有介紹：如張谷銘在其書評中推薦讀者可參考此書所提供的書目，參見張谷銘，〈評 Adrian Johns 著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新史學》16 卷 1 期（2005，臺北），頁 183，註 1；陳俊啟則根據此書討論，撰有〈另一種敘事，另一種現實的呈現：新文化史中的「書的歷史」〉，《中外文學》34 卷 4 期（2005，臺北），頁 143-170。

142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e McCleery,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43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e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p. 1-2;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e McCleery,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pp. 1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藏書清冊所未說的」，促使他對史料和計量方法的限制展開檢討。他的檢討讓 1970 年代的書籍史研究社群不僅持續發展書籍之生產和發行的歷史研究，也接受其他學科，如文化社會學所提供的新視角，而更能注意於開發新的材料，研究讀者如何獲取書籍、在哪裡讀的問題。此外，馬爾坦在此書的總結中提及，他因為缺乏資料而放棄處理讀者「所讀的書在多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反應」。這個以費夫賀的「心態裝備」概念為模式的提問，反而成為他後來用以回應批判和思考閱讀史研究的著力點。

正是在書籍之接受端已經受到關注的研究脈絡下，夏提埃接受了書籍史研究向來忽視探究讀者對讀物之使用的批評。他隨即提出「什麼是閱讀？如何重構古時的閱讀？」的問題，推動法國書籍史學建構關於閱讀的問題意識，以便重新思考書籍等印刷物的「文化作用與影響」。費夫賀的這個提問在 60 年代書籍史—心態史家的詮釋下，轉變成探詢書籍等印刷物所「顯示」或「反映」的集體心態為何。在此詮釋下，書籍史即使關注到書籍的接受端，卻視讀者為讀物的被動接受者。故馬爾坦和夏提埃在面對書籍史如何看待讀者和其閱讀的問題時，再一次回到費夫賀的概念和提問上，找尋可能的反省資源，他們也都需要不同於計量方法和社會史之社會劃分的研究取徑。

在夏提埃從事讀者對於讀物的使用、挪為己用等閱讀實踐的歷史探詢和概念反省的過程當中，文本和圖像的再現分析、文化實踐理論和麥肯錫的文本社會學構成他最主要的方法和理論資源。而馬爾坦對閱讀歷史的關注焦點不在於探究讀者自身的閱讀經驗，他持續以費夫賀的「心態裝備」概念思考書籍和閱讀的關係，透過書寫和文本編排的物質形式，以及其中所承載與傳遞的象徵意義，來了解形塑讀者閱讀和思考方式的條件。不過，馬爾坦和夏提埃各自的閱讀史觀點和研究取徑，卻在英美書目學的分析方法和麥肯錫所提出的「形式影響意涵」上又找到了交集。

「書籍使用的唯一線索就是書籍本身」，夏提埃在做此宣稱之前，已經嘗試在書籍之外尋找呈現讀者使用或閱讀的線索和材料。其中有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私人讀書俱樂部、租書店、圖書館等新開發的檔案資料，幫助他建構出法國近代早期讀者獲得書籍的管道、閱讀的物質環境等歷史面向，圖像和文本（也包括書籍提供的）所再現的閱讀方式（如高聲朗讀或默讀）和行為習慣（如私密獨處的閱讀或聚會分享式的朗讀、精讀或廣泛閱讀），以及私人傳記等呈現讀者內在閱讀經驗的書寫紀錄。在他長期研究《藍皮文庫》等訴諸庶民讀者之讀物的研究經驗中，此社群讀者閱讀經驗資料的稀少，以及對於其閱讀經驗和書寫此經驗的再現關係上之反省，都促使他更加體認到須從書籍本身——包括文本內容和文本編排的物質形式，獲致讓讀者得以挪用的條件。他不僅對麥肯錫的文本社會學，特別是認同其「形式影響意涵」概念，與馬爾坦一樣表達出對於文本物質形式的重視，也肯定在認識個體的適應性和實踐力這個文化史的問題關懷上，必須參照構成此實踐能力之所以可能的社會性和物質性條件。

英美學界視夏提埃的研究為「新風格的法國書籍史」，意指法國書籍史不再忽視讀者對於讀物的使用和閱讀，也不再將探究書籍之文化意義的工作自限於計算書籍數量或根據標題分類書目。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馬爾坦對閱讀史的關懷不在於讀者的個體經驗，卻在關注口語和書寫的關係、書籍和文本的物質形式上，參與和建構了此一「新風格的法國書籍史」。他甚至在對於書籍等書寫物所形塑的閱讀和思考方式之探究中，把書籍史的研究對象涵括至歷史上所有物質形式的溝通媒介。

藉由馬爾坦和夏提埃在書籍和閱讀問題上的檢討和研究，我們得以一探法國書籍史研究的融合和接納能力之建構過程。不過，他們從書籍史所延伸出的閱讀史研究，卻忽視了「作為讀者的作者」這個研究視角的重要性。作者本身亦即積極實踐其閱讀之挪用的讀者，並將其閱讀實踐表現在所出版的書寫文本中。在夏提埃對於書寫文化史的定義和反省的基礎上，本文最後以法國近代早期出版的書籍為例，檢視作為讀者的作者、編者在出版的書寫文本和其物質形式上展現的閱讀實踐。在費夫賀以「整體史」的理念對書籍史研究設下最高要求之後，有關印刷書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溝通媒介物之於社會的「文化作用與影響」這個提問，將在馬爾坦和夏提埃對閱讀史、書寫文化史的方法論反省和實踐的基礎上，激發更多檢視的視角和研究途徑。

*本文為國立臺灣大學邁向頂尖大學歷史系學術領域全面提昇計畫（95R0033-4）研究成果。感謝本系同仁閻鴻中、陳宗仁、陳慧宏老師，以及研究生王亞灣、涂豐恩同學對於初稿的回應與意見。匿名審查人細心的修正與具體建議，對本文最後定稿，助益甚大，在此致上最高謝意。

（責任編輯：林易澄　校對：鍾友全　劉哲宇　宋子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論著

張谷銘，〈評 Adrian Johns 著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新史學》16 卷 1 期，2005 年 3 月，臺北。

陳俊啟，〈另一種敘事，另一種現實的呈現：新文化史中的「書的歷史」〉，《中外文學》34 卷 4 期，2005 年 9 月，臺北。

## 二、西文論著

### （一）史籍

Scudéry, Madeleine de. *Clélie, histoire romaine, dédiée à Mademoiselle de Longueville, par Mr de Scudéry, gouverneur de Nostre Dame de la Garde.* Paris: Augustin Courbé, associé, pour les tomes VII à X, à Jean Blaeu à Amsterdam, 10 vols., 1654-1660.

Scudéry, Madeleine de. “Histoire et conversation d’amitié.” In *Conversations morales, dédiées au Roy*. tome II. Paris, sur le Quay des Augustins, 1686.

Scudéry, Madeleine de. *Esprit de Mademoiselle de Scudéri*. Amsterdam et Paris: Philippe Vincent, 1766.

### （二）近人著作

Ariès, Philippe.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In Philippe Ariès et Georges Duby, dir.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ome 3: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volume dirigé par R. Chartier.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6.

Barbier, Frédéric et Catherine Bertho Lavenir. *Histoire des médias: de Diderot à internet*. Paris: HER / Armand Colin, 1996.

Barbier, Frédéric. “Posteface. Écrire *L’apparition du livre.*” In Lucien Febvre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Albin Michel S.A., 1999.

Bollème, Geneviève, Jean Ehrard, François Furet, Daniel Roche et Jacques Roger, *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 postface d’Alphonse Dupront. Paris-La Haye: Mouton & Co., 1965.

Brokaw, Cynthia J.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Brouard-Arends, Isabelle, dir. *Lectrices d’Ancien Régim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urke, Peter.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avallo, Guglielmo et Roger Chartier, dir. *Histoire de la lecture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7.

Certeau, Michel de.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I, Arts de faire*. Paris: Gallimard, 1990.

Chartier, Roger. "Les arts de mourir, 1450-1600." *Annales: E. S. C.*, n. 1, janvier-février, 1976, Paris.

Chartier, Roger et Daniel Roche. "L'Histoire quantitative du livre."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u livre*, 16, 1977, Bordeaux.

Chartier, Roger et Daniel Roche. "Le Livre. Un changement de perspective." In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dir. *Faire de l'histoire, t. III: nouveaux objets*. Paris: Gallimard, 1986.

Chartier, Rog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Paris: Promodis, 4 vols., 1982-1986; réédition, Paris: Fayard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4 vols., 1989-1991.

Chartier, Rog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In Philippe Ariès et Georges Duby, dir.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ome 3: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volume dirigé par R. Chartier.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6.

Chartier, Roger. "Avant-Propos. La culture de l'imprimé." In Roger Chartier, dir. *Les Usages de l'imprimé*.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7.

Chartier, Roger. *Lectures et lecteur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Chartier, Roger.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Chartier, Roger. "Le monde comme representation." *Annales: E. S. C.*, n. 6, novembre-décembre 1989, Paris.

Chartier, Roger. "Texts, Printing, Readings."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Chartier, Roger. *L'Ordre des livres. Lecteurs, auteurs, bibliothèques en Europe entre XIV^e^ et XVIII^e^ siècle.* Aix-en-Provence: Éditions Alinea, 1992.

Chartier, Roger. "Du livre au lire." In *Pratiques de la lecture*, sous la dir. de Roger Chartier et à l'initiative d'Alain Paire. Paris: Éditions Payot et Rivages, 1993.

Chartier, Roger, dir. *Histoires de la lecture: Un bilan des recherches, actes du Colloque des 29 et 30 janvier 1993.* Paris: IMEC Édition /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95.

Chartier, Roger. "Popular Appropriations: The Readers and Their Books." In *Forms 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artier, Roger. “Les représentations de l’écrit.” In *Culture écrite et société. L’ordre des livres (XIV^e -XVIII^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S.A., 1996.

Chartier, Roger. “Patronage et dédicace.” In *Culture écrite et société. L’ordre des livres (XIV^e -XVIII^e siècle).*

Chartier, Roger. “Gutenberg Revisited from the East.” *Late Imperial China. 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 1, June 1996.

Chartier, Roger.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et 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In *Au bord de la falaise: l’histoire entre certitudes et inquiétud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S.A., 1998.

Chartier, Roger. “Pouvoirs et limites de la représentation. Marin, le discours et l’image.” In *Au bord de la falaise: l’histoire entre certitudes et inquiétude.*

Chartier, Roger. “Writing the Practice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1:2, Spring 1998, Seattle.

Chartier, Roger. *Publishing Dram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9.

Chartier, Roger. “Préface. Un Livre fondateur.” In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tome I.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99.

Chartier, Roger. “Culture écrite et littérature à l’âge modern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Pratiques d’écriture*, n. 4-5, juillet-cctobre 2001, Paris.

Chartier, Roger. “Comptes Rendus. Henri-Jean Martin, *La naissance du livre moderne. Mise en page et mise en texte du livre français (XIV^e et XVII^e siècles)*. Paris: É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99, 494p.”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Pratiques d’écriture*, n. 4-5, juillet-cctobre 2001, Paris.

Chartier, Roger. “La nouvelle histoire culturelle existe-t-elle?.” *Cahier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Regards sur l’histoire culturelle*, 31, avril 2003, Paris.

Chartier, Roger. *Inscrire et effacer: culutre écrite et littérature (XI^e-XVIII^e siècle)*. Paris: Seuil / Gallimard, 2005.

Chin, Man-Yi. “*Memoria* de l’“amitié savante”, son appropriation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la contribution des femmes du monde.” In *Amitié féminine et écriture épistolaire au XVIII^e siècle*. Thèse de doctorat, l’EHESS, 2004.

Chow, Kai-Wing.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olclough, Stephen. “Procuring Books and Consuming Texts: the Reading Experience of a Sheffield Apprentice, 1798.” *Book History*, 3, 2000, Pennsylvania.

Darnton, Robert.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Darnton, Robert.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avis, Natalie Zemon.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eight essay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Dewald, Jonathan. “Roger Chartier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Histor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1:2, Spring 1998, Seattle.

Febvre, Lucien. *Un destin: Martin Luther*.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8.

Febvre, Lucien. “Vivre l’histoire.” In *Combat pour l’histoire*. Paris: Armand Colin, 1992.

Febvre, Lucien. *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S.A., 1988.

Febvre, Lucien et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1971. 中譯版：費夫賀、馬爾坦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5。

Finkelstein, David and Alistaire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Finkelstein, David and Alistaire McCleery.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Fouché, Pascal, Daniel Péchoin et Philippe Schuwer, dir.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 sous la responsabilité scientifique de Pascal Fouché, Jean-Dominique Mellot, Alain Nave, Martine Poulain, Philippe Schuwer, préface de Henri-Jean Martin. Paris: É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tome I: A-D, 2002; tome II: E-M, 2005.

Ginzburg, Carlo.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Grafton, Anthony and Lisa Jardine. *From Humanism to the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 in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Greenblatt, Stephen.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Iser, Wolfgang.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Jackson, H. J. *Marginalia: Readers Writing in Book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Jackson, I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Readers and Read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7:4, 2004, London.

Jauss, 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lation from German by Timothy Bahti, “Introduction” by Paul de M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Kerrigan, John. “The Editor as Reader: Constructing Renaissance Texts.” In James Raven, Helen Small and Naomi Tadmor, eds. *The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aufer, Roger. “L’espace visuel du livre ancien.” In 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 Le livre conquérant. Du Moyen Âge au milieu du XVII^e siècle.* Paris: Fayard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89.

Laufer, Roger. “Les espaces du livre.” In 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I: Le livre triomphant 1660-1830.* Paris: Fayard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90.

Martin, Henri-Jean. “Culture écrite et culture orale, culture savante et culture populaire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Journal des Savants*, juillet-septembre, 1975, Paris.

Martin, Henri-Jean.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lecture.”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u livre*, 16, 1977, Bordeaux.

Martin, Henri-Jean et Jean Vezin, dir. *Mise en page et mise en texte du livre manuscrit*. Paris: É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 Promodis, 1990.

Martin, Henri-Jea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Bruno Delmas. *Histoire et pouvoirs de l’écrit*.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S.A., 1996.

Martin, Henri-Jea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99.

Martin, Henri-Jean et collab. *La naissance du livre moderne, XIV^e-XVII^e siècle. Mise en page et mise en texte du livre française*. Paris: É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2000.

Martin, Henri-Jean. *Les métamorphoses du livre: Entretiens avec Jean-Marc Chatelain et Christian Jacob*. Paris: Éditions Albin Michel S.A., 2004.

Martin, Henri-Jean. “Histoire du livre.” In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 tome II: E-M.

McDonald, Peter and Michael F. Suarez, S. J., eds. *Making Meaning: “Printers of the Mind” and Other Essays. D. F. McKenzi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McKenzie, Donald Francis.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ellot, Jean-Dominique. “Un grand chantier dédié au Livre et ses ‘coulisses’: le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 (DEL).”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u livre*, n. 116-117, 2002, Bordeaux.

Price, Leah. “Reading.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Book History*, 7, 2004, Pennsylvania.

Saenger, Paul. “Manières de lire médiévales.” In Roger Chartier et Henri-Jean Martin, dir.,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t. I: Le livre conquérant. Du Moyen Âge au milieu du XVII^e siècle*. Paris: Fayard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89.

Saenger, Paul. *Space between Words: The Origins of Silent Read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Sevell Jr., William H. “Language and Practice in Cultural History: Backing Away from the Edge of the Cliff.”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1:2, Spring 1998, Seattl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ernet, André, Claude Jolly, Dominique Varry, Martine Poulain, dir. *Histoire des bibliothèques françaises.* Paris: Promodis / Cercle de la Librairie, 4 vols., 1988-1992.

Wolfgang, Iser.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The Methodologies of Two Historians of the Book: Books, Reading and Written Culture in the Works of Henri-Jean Martin and Roger Chartier

Chin, Man-yi*

## Abstract

Among human sciences, such as sociology,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hilosophy, which have been studying the question of readers and reading,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France has submitted itself to a deep self-criticism since the 1970s. The two leading figures of this trend are Henri-Jean Martin, recognized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and Roger Chartier, who has developed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the question of readi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se two historians have built up a relationship between books and reading upon the existing foundation of pas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On the one hand, in my analysis of their conceptual tools and approaches, as well as the comparison of the materials they have used, I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as well as similarities between H.-J. Martin and R. Chartier's points of view on questions such as individual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related social and material con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I show how the historians of the book in France are shaping their research framework in a triple perspective: production, diffusion and reception, and how they are extending their studies to all material forms of communication. However, I do think that the history of reading developed by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has overlooked an aspect which seems to me important: the author and the editor are themselves *a priori* readers. In order to study this point, I follow H.-J. Martin and R. Chartier in the new field of "written culture", especially R. Chartier who has defined and reflected upon it. Finally, on these grounds, this article shows in which respects, authors and editors, considered as readers also, act upon the text or the form of the text in order to build a communication with readers and reveal their own reading practices.

**Keywords:** H.-J. Martin, R. Chartier, history of the book, history of reading, history of written culture.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